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吳宗昇

污名語境中口音的「體」現：如何「做陸生」

The Embodiment of Accents in Stigma Context:
How to “Making” a Mainland Student

學生：何依涵撰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二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污名語境中口音的「體」現：如何「做陸生」

The Embodiment of Accents in Stigma Context:
How to “Making” a Mainland Student

學 生：何依涵 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二月

系所章戳：

謝辭

雖然論文的研究對象固定在陸生主體，但在整個前期準備與寫作過程中事實上也一直在跟不同群體打交道，與世界一起經歷令所有人都難以忘懷的 2020。在這個族群/世代/性別/派別撕裂的時代裡，似乎只要不被舉報、沒有惡言相向都是可以算得上一件「值得感謝」的事情。但反過來，能夠在這樣充滿裂痕的時空裡獲得來自不同立場/身份屬性的支持，更顯得彌足珍貴。

感謝胡克威老師與吳宗昇老師的論文指導，尤其是吳老師一直以來不僅止於學術上的關心，我總覺得自己像一位中途插入但依然得到平等關愛的插班生，得到的鼓勵在很多個時刻都彌縫了我寫論文時的焦慮情緒；感謝每一位在世界各個地方的受訪者，非但沒有拒絕我這位並不熟悉的人用電訪的方式彼此聊天，更是一直打氣加油、抽絲剝繭自己的心路歷程，希冀能夠給我更多資訊；感謝一定看不到這篇文章、但永遠都不計較女兒持續往前走需要多少時間與物質基礎的父母，你們是我獨立在海外求學的心安；感謝陪我一路走來、總是讓我慶幸可以有朋友如此的勤遠，是妳接住很多時候喃喃無力的我；感謝包容我許多的雙妍、同同、瑞瑞、擻擻等一眾見證我「難產」的好友們；感謝願意做我論文回應人的初冉，感謝領我進入社會學雙修路程的傅陽學長，感謝路上遇到的每一位人。

最後要感謝我的女性主義啟蒙人、社會學燈塔兼男友的胡益禎，不論最後我們會行至何處，我都感激這次相遇。

摘要

本研究將主要探討赴臺就學的陸生，在「祖國邊緣」遊走時日常生活狀態的行為特點，尤以「藏口音」與否作為探究的身體經驗基礎，挖掘藏與不藏背後的行為展演 (Performance) 動機；再以此找尋一批具有公共行動力的陸生個體，透過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的方式研究他們在台灣公民社會中的行動力、表現力與局限性，一方面看其間是否有孕育衍生出一些曖昧地帶、能給兩岸如今張力愈來愈大的拉扯關係以何種影響；另一方面也得以從陸生們的行動中看出兩岸、乃至國際時代格局的新冷戰轉向。研究內容將與 Goffman 的污名概念對話，認識到陸生群體本身可以同時是「明貶者」(The Discredited) 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再從梅洛龐帝等人的身體現象學出發，以探究陸生如何要以「活生生的身體」(the Lived Body) 面對各式污名狀況，並提出了「談吐的鏡像」(Speech in Mirror Image)，看到這些於縫隙中掙扎的人是如何營造出與「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gress)、如何「做」陸生的。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behavi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ily life of Mainland students who have moved to Taiwan for study and who wander on the edge of the motherland,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accent-hide” and especially the motivation behind such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through deep,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ticipated observation of a group of Mainland students who are active in public places, to know their acting ability, expressiveness and limitations in Taiwan’s civi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the research determines whether there is ambiguous space or positive influence between the tense cross-strait situation in this decade.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also have a glimps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ross-strait, or eve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ve’s change from the small details from these movers’ actions. The study responds to the Stigma concept from Goffman, realizing that Mainland students can be "The Discredited" and "The Discreditable". Inspired by the phenomenology of body from Merleau-Ponty,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igma, Mainland students gradually discover and shape the "Subject in Progress" through the “Speech in Mirror Image”, creating their identity step by step, which is a kind of agency under the structural pressure.

Keywords : Mainland students, Stigma, Accent, Phenomenology of Body, Identity.

目次

謝辭.....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 「你是台灣人？」.....	1
(二) 誰理解誰更「殘忍」？.....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三節 文獻回顧.....	5
(一) 龐大又邊緣的跨境移動者.....	5
(二) 口音的「體現」與認同的污名.....	8
(三) 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者們.....	12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16
(一) 研究問題.....	16
(二) 研究方法.....	16
(三) 樣本選取與說明.....	17
第二章 跨境之前：想象與重曝.....	19
(一) 為何跨境.....	19
(二) 不能準備的衝擊.....	21
第三章 污名語境下口音的「體現」.....	24
(一) 污名下的口音意識與展演：認知與回應.....	24
(二) 「體現」的口音：作為行動者的陸生.....	32
第四章 疫情下的滯留與轉變.....	40
(一) 猝不及防的指引與兵荒馬亂的自救.....	40
(二) 被「獵巫」的恐懼.....	44
(三) 返台之後捲土重來的身份練習.....	47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局限.....	51
(一) 研究結論與結語.....	51
(二) 研究缺點與局限.....	53

附錄	55
(一) 受訪者資料	55
(二) 訪談大綱	56
(三) 訪談同意書及保密協定	58
參考文獻	60
中文期刊	60
學位論文	62
中文書目	63
英文參考資料	63
網絡資料	6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 「你是台灣人？」

因筆者自身身份之特殊性，在就學期間意識到自己曾數次得到「我以為你是臺灣人」的驚訝評價，配上不敢相信的眼神與再三確認的問句，總覺得在尷尬的同時卻「妙趣橫生」。之後則漸漸發現這樣的經歷無獨有偶，「常常有人跟我說臺語」的陸生朋友不在少數，而除此之外，也有一友人曾在某公開情境里突然顛覆以往的鄉音、改以「臺灣腔」與他人溝通，之後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由此得到了「惡作劇般的快感」——怪誕的對立行為顯現了——似乎身邊的陸生口音在能改變的前提下大都可分成兩大類：一為消融，一為堅持。而筆者在研究之前以為，這種或消融、或堅持的外在表現實際上是口音的展演程度體現，內尋脈絡則將涉及國族/文化認同的立場；當這兩派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與他者共生時，便會對應發展出相對不同的情境模式：消弭口音者似乎總能比堅持鄉音派獲得更多的在地資源，拓展出更廣闊的非陸生圈人脈，與此同時對於臺灣這片土地的情感聯結亦更為深厚，對於「原鄉」的反身性思考、審視更多元¹。

另一方面，又因兩岸特殊的歷史糾葛，在過去並未被妥善處理、也難以在未來達成共識的種種問題，隨著媒體科技的光速傳播、不同教育體制下的經年累積，層層疊疊地烙印在社會中的每個個體身上時，便出現了更多有趣的場景。筆者因機緣巧合及部分興趣，曾數次參與社會活動、走在線下人頭攢動的街頭或在線上同他人大段地爭辯自己的理想。在一次死刑辯論中，筆者意外收穫了友人埋藏著深深偏見與難以言說的「惡意」的讚揚：

XX（筆者名字）你根本就是台灣人誼！應該讓你這種中國人都過來，然後把台灣的白癡立委們都送到中國。

事實上，正是因為這種實際並無惡意、但聽來酸甜苦辣皆沾的評論頻繁出現在筆者的生活內，也令筆者不斷去思考：這種具強針對性、但相較黑人或LGBTQ等族群所受的並不那麼直接的歧視，究竟是為何而誕生？如若筆者算是

¹ 但之後的研究驗證了這點只是部分存在的事實，並無絕對因果關係。

親近台灣的、能夠被當做「我群」(We Group) 之內的他者(The Others)²，那麼其他因為種種原因並未與台灣社會建立多少聯結的陸生，又會有什麼樣的生活經驗？身為少數群體(Minority Group) 的一員，陸生們能否行動、如何行動，以面對那些潛在污名帶來的困境？

(二) 誰理解誰更「殘忍」？

在「理解普通中國/大陸人處境」的話題下，筆者曾多次在網絡對戰、現實討論中遇到一種說法是「我為什麼要理解拿炮彈對著我們的國家裡的人？」；在參加一次線上讀書會時，又聽聞有陸生談論自己在台灣受到的「種族歧視」³。事後筆者將此事與關係甚好的台灣友人分享，得到如下回應：

陸生在台灣是少數族群沒錯啦，但你會覺得一小群在黑人社區裡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白人是受到「種族歧視」嗎？我不會用這種詞形容陸生的處境。

事後這位友人表示，TA 想強調的是「種族歧視」一詞的語境不可逆轉，就像在父權社會底下若有部分男性遭受部分女性的戲謔與嘲笑，並不能被認定為是「性別歧視」：這種表面上是基於種族/性別而引發的針對性的歧視問題，事實上是更大的、且完全相反的歧視框架（父權社會/國際社會中的中國與台灣問題）在支撐、造成了眼前這種「小」局面。友人還加了一句「你知道你們有多少炮彈對著我們嗎？」，後續同時表示抱歉，因為「但這確實不代表任何一種反向歧視都應該被合理化」。

可以看見在這種論述中幾乎是將陸生不可選擇的國族身份擺到了對立、甚至敵視的位置，而無論是認定陸生與台灣人之間具有不可逆轉的「種族歧視」語境，還是將「炮彈說」置於一切討論的開頭或結尾，無不代入了一種宏大又現實的國際關係處境，及台灣人生活在這種處境/語境底下的焦慮與憤恨。在這樣的脈絡底下，似乎叫台灣人去理解陸生是顯得有些「殘忍」的；但同樣的，若讓初來乍到、因政治身份所帶來之在大部分情境裡具有「原罪」而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陸生，再反過來去理解攻擊 TA 的社會的歷史知識、政治脈絡與地方色彩——原本在一般社會情境中得以「正常」交往的個體，卻因為某種或原生或後天遇到的

² 因事實上在講出「根本就是 XX 人」時，仍然暗含了「先有一個 XX 人」的前提，以及一種你正不斷靠近、成為 XX 人的讚歎——誰向誰靠近、誰作為主體詞語呈現都顯現出一種隱微的上下等級——「根本就是 XX 人」的潛台詞是，你「首先不是 XX 人」，然後才能進入到 XX 人的群體裡。

³ 該陸生認為，其因為身為「中國人」的身份，便在台灣遇到了一系列是因應這個身份才有的歧視性問題。

屬性（所謂「敵國」身份）、而使其他應該得以被公正對待的屬性遭到了掩埋（Goffman, 2017c）——或許也一樣是「殘忍」、苛責的。

在底片攝影里，有一種玩法叫做 Film Swap and Double Exposure：將拍完的一卷底片與好友交換或到另一個不同空間位置中繼續拍攝，得以重曝。拍攝時需注意的是其中一方的曝光度要有所調整，若處於同樣程度的感光值將會使最後得到的結果過曝；而因拍攝的當下對未來的成像無法預測，故最後呈現出的將是不同人或同一人在不同時地的構圖念想之別，及其融合之果——來臺讀書的陸生，首度跨出地理認知上的國界，來到本只存於傳播媒介與自編課本中的土地上生活時，這期間所親歷的來自個體之間的文化衝擊與群體之間的意識形態碰撞，或多或少都將產生民族意識與國族認同的搖擺。那些意識想法已經被迫感光（假使主動裝上膠捲、按下快門的人是社會結構安排的各人成長背景）而映畫在大腦中，是先前設置好感光值、快門速度、被決定的一種構圖畫面，而來到臺灣後則又不斷的調整參數進行重曝，重曝的結果是過曝、全部覆蓋還是對原圖影響甚微，當絕大部分取決於那些參數，及能動者們自身面對政治社會的調整——且在被烙印成像的當下，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形狀。

在認同經歷搖擺之後，通常會產生幾種不同的面向態度：對於在台整體生活的、台灣人的、生活之城市的、台灣政府的乃至作為整體符號代表的「台灣」，有些人會產生清晰的劃分，對於其中一部分（例如政府）主動或被動地冷眼築起心中壁壘，同時也能對另一部分（常是生活的城市及台灣朋友）保持開放與接納；有些人則會全然一視同仁，厭惡者恆拒絕之、熱愛者恆包容之。過去我們都知道，這些情感將對陸生的日常生活行為起到一定影響、使陸生在日常細節中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但筆者好奇的是，不同情感作用於這群少數陸生身上時，TA 們的公共行動力會有怎樣的區別？台灣人與陸生雙向理解的過程裡，又有哪些東西在阻礙、使得我們會認為令一群人理解一群人得以達到「殘忍」的地步？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主要探討赴臺就學的陸生⁴（此指一年以上的學位修習，不包括短期半年交換生），在「祖國邊緣」遊走時日常生活狀態的行為特點，尤以「藏口

⁴ 為「中國大陸學生」之簡寫，而與之採取不同意識形態的稱法是「中生」，即「中國學生」之簡稱。本文將一概採用教育部公佈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關係條例》中所用之「陸生」稱呼來表示，「中生」還是「陸生」的分辨並非本文重點。

音」與否作為探究的經驗基礎，挖掘藏與不藏背後的行為展演 (performance) 動機，再以此找尋一批特別的陸生個體在台灣公民社會中的行動力、表現力與局限性。他們或許是各校級、市級、省級的陸聯會負責人，或許是站在街頭為陸生爭取權益的普通「陸」人，亦或許是在遇到如 2020 新冠疫情般的巨大變動時毅然幫忙的「小透明」。研究將同時在探討「一中」⁵脈絡下成長廿年的陸生在公共領域中同時作為「明貶者」 (The Discredited) 與「可貶者」 (The Discreditable) (Goffman, 2017c)的行動困境與角色扮演，如何面對可能存在的污名困境，看其間是否有孕育衍生出一些曖昧地帶，是否能給以兩岸如今愈來愈大張力的拉扯關係一些可能的影響。

傅榆導演在 2018 年第 55 屆金馬獎時發表的獲獎感言⁶，以及之後產生的漣漪效果 (徐們的「兩岸一家親」與徐崢的「中國電影」願景) 一度成為兩岸藝界的政治熱點；在 2019 年六四三十週年際，臺灣、香港以及歐美都陸續發表許多研究結果，還原呈現當年的影像報導，同時皆舉行了多種形態的行為藝術以訴諸抗議、宣示或指責；後半年在香港發生的反修例運動，亦使相關國族意識、本土文化的討論在太陽花學運、雨傘運動後達到新高潮；2020 年伊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燃燒全球，陸生先是受到了台方一具有歧視性的《指引文件》的不公正對待，再受到國內中央突然禁止的赴台政策影響⁷。在這些以及其他更多相似事件中，除去在兩邊受各自不同環境滲透下成長的「純」臺灣人、「純」中國/大陸⁸人，遊走在曖昧地帶、已被迫與兩邊的土地同時建立其情感聯結的陸生，或許是同時具有又不具有發語權的一類群體 (在中國的臺生情況並不相同，詳見文獻回顧) ——是強化邊緣概念後的「異家人」，還是消弭、柔化邊緣後的「一家親」，應是在這份場域中的陸生都無法避開的現實問題。

然而在顯而易見的政治性歧視環境中，這些「國際上的強勢多數」逐漸翻轉成為在台灣社會中的「少數族群」(中正 e 報, 2020)，在多數議題排山倒海般爭執辯論之時，TA 們的聲音是否有被聽見？在兩岸拉扯局勢愈發極端的現在，TA 們的想法以及公共行動是否能代表另一種民主自由上的告解？筆者希望在這樣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下，以半結構式訪談、參與者想觀察等研究方式搜集資料、

⁵ 即「一個中國」，中國/大陸政治光譜中的一項「基本原則」。

⁶ 「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⁷ 實際上這一政策對已在台就讀陸生並未有實質影響，但是引起的兩岸仇視言論卻真實的落在陸生身上。

⁸ 在本文的研究裡，國族的劃定乃討論之範圍而非既定之結果，故涉及時將一併以中國/大陸為名，讀者可各取所需。

探求口音展演行為在陸生身上的體現脈絡，試圖與離散、污名、身體的存在現象學等理論對話，探討在污名身份下的這群人將如何行動，又如何行動中依靠活生生的身體力量找尋自己的主體存在。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 龐大又邊緣的跨境移動者

據 201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數據⁹，全球留學生數量早已超過 500 萬人次，而其中最大的留學生源中國，在 2017 年的留學人數則超出 60 萬。如此龐大的留學生團體，卻是在早期的跨境移動研究中被長期忽略的邊陲領域 (張育嘉, 2015; 藍佩嘉 & 吳伊凡, 2011; Szelényi, 2006)；至於「陸生」，更是有別於一般的留學生群體：有相當多的訪談材料及研究表明，對於大部分在「一中」氛圍中「自然」長大的陸生來說，旅台進修不能夠算是「出國」，但也同時因為略微尷尬、難明的兩岸關係而難以稱之為「跨省」，故一般以「出境」代之；對於台人而言，進入台灣島內學習的這批中國/大陸學生，既不能夠算是純粹的「外國人」但也難以將其作為「本國人」看待，甚至這些「大陸地區」之「國民」只是活在文件中的一種符號表述，其實際之教育權、工作權皆在外籍之下 (王嘉州, 2011, 2012; 李佩雯, 2014; 張育嘉, 2015; 羅曉妹, 2017)。且如此晦澀曖昧的位置，是難以在旅中台生、旅中港生及赴港陸生身上找到類似境況的。

而談論到這種跨境移動的族群，尤其在台灣這塊想象上很近、但實際體制上或許很遠的土地上生活兩年到九年¹⁰的陸生，或許不得不要梳理「離散」(diaspora) 的概念。「離散」的定義從最初的猶太人、希臘人離群散居之描述，發展至今已 (廣義上) 擴展為「移民從他們真實或想象的家園中離開」(Fiddian-Qasmiyeh, Loescher, Long, & Sigona, 2014)，所以會包括移民 (immigrant)、難民 (refugee)、旅居國外者 (expatriate)、僑居海外群體 (overseas community)、被放逐群體 (exile community)、移工 (guest-worker) 等；歷史人類學家 Clifford (1994) 在分析離散群體性質時整理出了三個核心特徵：

⁹ <http://uis.unesco.org/en/uis-student-flow> (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

¹⁰ 科技大學類是兩年制，一般學位生為四年制，還有許多陸生是從專科/學位生讀完之後繼續在台灣讀碩博學位，待台灣最久的時間理論上可以達到九年 (2011-2020)。

- 一、 空間分散 (dispersion in space)，其中分散的方式會分為強迫性驅散及其他種分散。
- 二、 面向「家園」 (orientation to a “homeland”)，即將想象或真實的家園作為個人價值、身份及忠誠度的權威來源。事實上，政治學家 Safran(1991)提出之六條定義「離散」的標準裡，就有四條與「家園/祖國」相關(例如保持對祖國的集體記憶或神話傳說、將祖國視為真正的、終將返回的家園、無法融入客鄉等)，但後來被批判這樣的定義「與其說是針對某個特定地方的溯源和回報的慾望，不如說是一種在不同地點重建文化的能力」(Clifford, 1994, p. 306)；比起圍繞具體而單一中心的原生地的目的論，去中心化的聯結或許也一樣重要。
- 三、 界限維持 (boundary-maintenance)，即個體相對於東道國/社會的獨特身份的維護；這種界限的維持又通常是透過如自我強化的內婚製、自我隔離等有意抵抗，或社會排斥的意外結果而實現的(Armstrong, 1976)。在大多數情況下，「界限維持」與否會是判斷「離散」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只有這一點才能使得大家認同離散者們經由獨特的團結而形成了一種社群(Cohen, 2008, p. 24; Tölölyan, 1996, p. 14)，而 Clifford(1997)亦指出，在這些文獻回顧中存在一種有趣的現象：即使我們很常強調身份的維護與界限的維持，但有一種強烈的「逆流」(counter-current)卻也同時在強調混雜性 (hybridity)、流動性 (fluidity) 及克里奧化 (creolization)¹¹的重要性——所以在離散相關的文獻中會呈現「界限維持」與「界限消融」(boundary-erosion)的張力。

儘管上述離散群體類別的舉例中並未明確包含「境外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¹²)，但根據這三點核心定義，陸生無疑是符合的：搭載全球性流動與兩岸試圖交好的快車選擇分散、前往至台灣就學，但立足於這座小島時卻時刻有「面對金門遙想大陸」的鄉愁，或在每年十月時堅持選擇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一國慶，而非台灣沿用當時國民黨定下的雙十國慶；並且陸生於在地交往的過程中，雖不會也不能靠內婚、地理隔離等方式強化群體的界限，但仍舊有陸聯會、同鄉

¹¹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該詞最初是指是克里奧爾語語言和文化出現的過程，後來則用來描述「由社會與移民之間的交往帶來的新的文化表現形式」。

¹² 在這裡將不採用「Foreign students」的翻譯，因為陸生就介於「本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之間的位置。

會等組織時刻準備好接住那些難以融入台灣社會的老鄉，並無形之中形成陸生在台灣的社交界限。事實上，對於大部分旅中台生而言，去中國/大陸基本意味著「出國」，甚至有許多人在中國/大陸待了一段時間、社交時會在言談中表達出對「一中」的認同，但內心的觀點則遊走在「祖國」與「外國」之間(吳伊凡 & 藍佩嘉, 2012; 藍佩嘉 & 吳伊凡, 2011); 而香港與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任何地理位置上的阻隔，更重要的是香港於 1997 年在國際見證下「正式回歸」，相較而言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學生則是一塊活在教科書與媒體報導裡的「亟待收復」之領土，一種「民主試驗基地」、「民國傳統之遺風」(張可, 2019)，故赴港陸生亦不如赴台陸生般有許多行前既有的好感與好奇，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亦不如台灣與中國/大陸那般涉及到國際地位與資源的極具緊張的拉扯，兩類跨境學生在跨境移動的經驗中其感受到的衝擊與震撼更不可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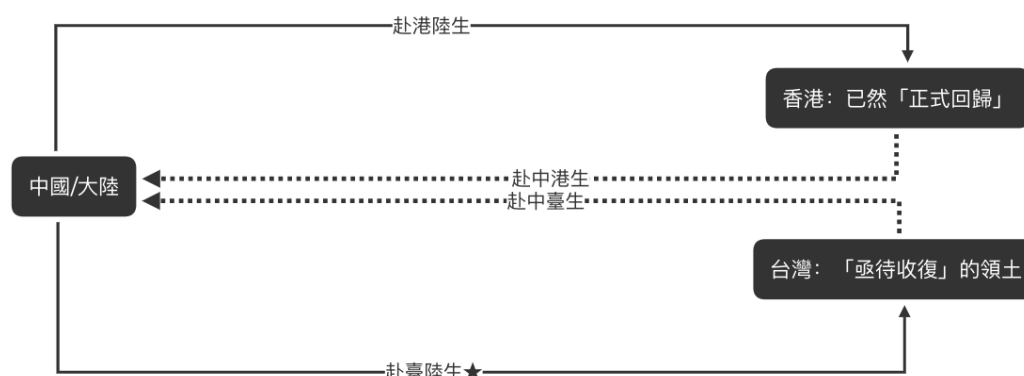


圖 1：在中國/大陸官方語境下的兩岸三地學生移動類型

據陸委會 109 年最新統計，目前在臺陸生人數約為八千人，遠少於外籍勞工 70 餘萬人、外籍新娘 55 萬人¹³，但因為有許多人同意並支持開放陸生來台政策的初衷為使台灣教育國際化、令其產生的經濟產值補足由少子化引發的教育體系漏洞，及更能促進兩岸之間的經貿政治友好關係(吳秀玲, 2013; 周欣怡, 2015; 張瑞雄, 2010; 黃萬傳, 2013)，故事實上，2010 年行政院通過的「開放陸生來台相關條例」使「陸生」這個群體從一開始就落入「兩岸友好大使」、順便搭救台灣教育系統「僧多粥少」的預設角色裡——這個角色的人數僅僅佔台灣總人口的 0.03%¹⁴，卻似乎在誕生之初便承擔著對外是認識當代中國的標本、對內是民主體

¹³ 參考台灣行政院、勞動部官網資料

¹⁴ 按陸生在台人數 8 千、台灣總人口 2378 萬來估算 (取自 2019 年臺灣教育部之統計)

制的側面驗證之雙重重責。故也因此，在前幾年關於陸生的研究裡，多集中在對於開放該政策的實際效益的驗證(王嘉州, 2011, 2012; 蔡翠旭, 林翠蓉, 陳怡珮, & 程伊昉, 2012)，而非以陸生為關心主體的探究其身為一個「跨境移動者」的調適情況；後中間兩年漸漸出現了對於陸生群體本身的觀照、將其與外籍生及僑生作比對，或是去我群中心主義的反思整個台灣社會對於該群體的政策落實(王鵬, 2017; 古曉婷, 2015; 李佩雯, 2014; 張育嘉, 2015)，亦開始討論政治環境對陸生的國族認同產生的影響及原因，如科技使用的偏差、資訊獲取渠道的迥異等(周祝瑛 & 魯嬪文, 2016; 徐恩惠, 2019; 黃亞楠, 2016; 黃崇山, 2016; 楊柳 & 陳懷林, 2020)。

但縱觀過去的相關研究中，雖然已有部分討論到陸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表現自己，包含日常行為中口音帶來的尷尬等具體觀察(李佩雯, 2014; 張育嘉, 2015)，或看陸生的國族意識在與人交往行為中如何被展演，卻均沒有觸及到以「口音」在主動意識上的掩藏或展露的背後的行為動機，更缺乏將陸生放入潛在受污名對象的框架內討論陸生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徑。Gilroy(1991)便認為以「身在何處」(Where you're at) 取代「來自何方」(Where you're from) 的路徑能夠成為難有定位 (fixing) 的離散者們的一種寄託，而創造性的融合 (syncretism) 則可以容納、雜糅原鄉與客鄉以創造出動態性的認同。故如何描繪、勾勒出陸生在台灣的生活狀況圖，或許需要更多從口音、身份認同與公共行動的交織討論。

(二) 口音的「體現」與認同的污名

A way of pronouncing the words of a language that shows which country, area or social class a person comes from; how well somebody pronounces a particular language¹⁵.

根據牛津字典給口音 (accent) 的第一定義中可以看見，口音是一種搭載著說話者社會背景的載體，嘴巴開合之間便能判斷出一個人的來源地乃至社會階層。多明尼加裔美國女性作家 Julia Alvarez 的第一本小說《How the Garcia Lost Their Accents》(《嘉西亞女兒如何失去她們的口音》，以下簡稱為《嘉西亞》) 便描述了自多明尼加共和國逃亡至美國紐約的一家人，在新的文化環境裡重新學習語言、尋找認同的故事(Alvarez, 1991)。在書中探討了「認同」裡究竟有什麼，是什麼構成了一個人的文化認同，描述了主人公們在「舊世界和新世界的雙重記憶

¹⁵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accent_1. (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

(dual memories)」中找尋與發現自我的漫長過程。謝瑤玲(2009)在分析中指出，「所謂的『融入』(assimilation)並不止於建構，更是一種遺忘和記憶的扭曲」，陸生或許學會了在台灣的一種生活方式與適應節奏，但註定「永遠無法脫離介於中間(in-betweenness)的地位」，註定「在兩個族群之間扮演永遠的異鄉人」。但只有憑藉在多種文化中糾纏(entanglement)、互動，這種中間人(陸生)才能完成新的「自我界定」，而重新「做陸生」、擁有「陸生」的特別認同；文章中也指出，在經歷「文化措置」(cultural displacement)時，文字與語言的傳達將會是尋找(及表達)自身認同的關鍵——在有能力抉擇語言走向的前提下，確定如何傳達自己的語言將會是打造自身認同的第一步。

依靠身體、運用身上的某種器官/部位以打造物質性的「體」認，正是身體社會學中討論社會存有(social beings)及其基本的一環。整體而言，現象學派與女性主義的哲學家們早就在20世紀後葉就對於「活生生的身體(the Lived Body)如何於其所處之處境中活動」有許多真知灼見，亦能夠為本文帶來啟迪：莫伊與梅洛龐帝便都提出過「身體即處境」的看法，認為身體本身所具有的實質性生物特質(例如年齡、種族、性別、形體等)將會切實影響到這具身體在社會中與他人相處的境況，故在研究社會中的主體時應當觀照到身體在社會關係與實體空間中的進退伸縮(像是低頭、抱胸)，以及與之對應的感官知覺(Merleau-Ponty, 1996; Moi, 2001)。但是莫伊這種解構生理決定論、強調具體身體存在的女性主義流派代表，常常會因為過於注重個體感知上的差異而讓所有的討論碎片化，使性別概念在被鬆動的同時又難以回到結構系統中改革解決(Young, 2007)，於是後來的女性主義政治哲學者 Young 在統合著述陰性身體經驗時，則同時參考與改良了「體」認理論的路徑，認為我們在關注主體之慾望與感受時，應該回歸到歷史脈絡、社會與文化權力的分佈、人際關係的目光下，「批判又整合的貼近身體」、進行「有關聯性又有能動性的詮釋」(Young, 2007, p. xx)。

至於「身體」與「認同」之間的關係，研究性別議題的學者何春蕤(2002, pp. 3-11)在《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一文中便曾藉由 Jay Prosser 與 Didier Anzieu 兩位學者對於「體現」(embodiment)的說法仔細爬梳，認為所謂「自我」與「認同」並不僅僅存在於精神領域的認知，而是「很物質的根植於身體的感覺」；不論是「自我」還是「身體」本身都是開放動態的，並且能夠根據不同環境與氛圍或尋求或營造出不同的「身體安居感」。前述在《嘉西亞》書中所提示的、在糾纏與互動中產生主體性的思考，恰可以與何春蕤老師對「身體」與「認同」之

間的思考對話：在構築、管理身為陸生的這份社會存在時會浮現出陸生獨有的「主體性」，而如何傳遞一種象征身份的口音，便會在前後斡旋、進退選擇的經驗路口動態靈現，以達到表層身體與內心靈魂和諧的狀態。

「認同」又是什麼？Tylor(1997)認為，他者的承認/誤認都是與自我認同建構高度相關的，我們的認同是由於他者的承認（recognition）、或這種承認的缺席（absence）以及他者的誤認（misrecognition）形成的；Jeffrey Weeks(1990)則認為，認同仍有關於隸屬（belonging），即一個人與其他人有何共同之處、與他者有何區別之處——認同可以給我們一種「個人的所在感」（a sense of personal location），使個體性（individuality）穩固、保持；另一邊認同又關於人們的社會關係，即人與他者如何透過複雜的關係網絡牽連、拉扯著。Bradley 更順勢提出有三層次的社會認同：被動、主動與政治化。所謂主動的認同通常會發生在防衛他人行動或者感受到被他人用負面方式界定、差別待遇時誕生(轉引自孟樊, 2001)。在社會心理學屆的 Mead 與 Goffman 則皆認為個人會依據他人的評價、將社會納入思考範圍內而產生一種動態的自我認同。可見，幾乎所有的「認同」概念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指向了他者，仿佛這樣東西會經由詢問而來，而非自我覺察(Ang, 2001)。所以當陸生因為口音問題而被問到「你是哪裡人」/「你是台灣人嗎」的時候，都需要不停思索忖量「我是誰」，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還需要更進一步認真面對情境來推敲斟酌「我要如何表達『我是誰』」。船隻駛向何方將取決於風帆如何升揚、舵手如何掌盤，故若「表達」為舟，「我是誰」之意義為遠方，則可以操縱那象征身份的口音的主體便成為了自己的舵手——在表達認同的途中，我們都是自舟的掌舵者。

在 1991 年的著作裡，Anderson(2010)描述了他眼中那個小說與報紙方興未艾的 18 世紀，民族的共同想象藉由「同時性」的閱讀得以建構的歐陸世界；十年後 Anderson 再次指出電子傳媒對於營造國族想象的影響，傳媒所建立的虛擬環境使一群即使不住在祖國的人也能夠衍生「遠距民族主義」(distant nationalism) (Anderson, 1998)——移民群體的身份確定需要靠「認同的過程」來獲得(王明珂, 1997)，作為建造事實之「特殊連帶」(particular solidarities)的語言，搭乘著各時代的媒介在無數個個體之間穿梭串聯，交談時的口音、可區別的地理位置及因此衍生出所屬的不同飲食習慣、政治文化體系，人際網絡得以輕鬆搭建與分野；故而依著語言所迴旋、生產在每個人的腦中及耳邊的「口音」與「敘事」，便也成了共同體形成的一種方式。

許慧如曾對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進行調查，發現外省第二代國語在「親切」面向上遠低於「台灣國語」，而中國的華語（無論南北方口音），在各方面評價甚至皆更低於外省第二代的國語（許慧如, 2019, pp. 236-238）。「台灣國護照貼紙 Taiwan Passport Sticker」粉專則曾發文建議網友，區分 *Chinese* 跟 *Mandarin* 的分別，認為：

「Mandarin」這個語言，在台灣全名為「中華民國國語」，是終戰之後被中國國民黨強行植入的殖民語言，不過到了今天已經被內化成具有台灣特色的語言，跟「Mandarin」起源地中國的「普通話」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出入¹⁶。

由此可見，未曾經歷過國語運動的台灣年輕世代，會對中國的華語有明顯的分割線，在主權意識興起、獨立自主聲音不斷迴響的台灣當代裡生活，陸生們在這裡就會同時是「明貶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

「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在 Goffman 的說明裡，常常是一群不具備高感知性、顯明性、可見性或已知性的群體，例如一位會酗酒的工作夥伴，在清醒工作時通常不會被他人感知到其有「性格缺失」（即酗酒的「惡習」），故這群人不僅有「訊息控制的需求」，也會擁有對「缺陷」的管理能力，能夠決定何時、何地、要向何人揭露自己；「明貶者」（The Discredited）則有「管理緊張的需求」，在一個空間裡當其身份已經被確立、烙印為是一種污名時，就需要承受刻板印象、與「正常人」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也是受污名者的基本矛盾（Goffman, 2017c, p. 129），在認為自己並無異於其他人的同時，卻又不得不在各種不利的環境中看見、體認這樣一種事實：自己就是被區分的。

另一種對於口音的抉擇，即在研究背景中提到的那位日常保持鄉音、偶爾故意顛覆以「台灣腔」模仿的友人的狀態，這種需要分別、刻意的顯露，如受訪者所言或許是為了表達出一種即使我也有這份對民主自由的想象、但仍選擇捍衛鄉音的堅持；受友人點醒，這近似尼采提出的「保持距離的熱情」（Pathos der Distanz）。而個人動機原因複雜多變，應要依照訪談個案以繼續推演背後的原因，或許這裡的區隔是一種對原有國族意識認同的堅持。但無論是有意的偏向在地口音還是有意的保持鄉音，身為一個主體、如何生活與行動的這份「意識」都佔據

¹⁶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PassportSticker/photos/a.1470612246581878/1477641505878952/?type=3&theater>（發表於 2015 年 11 月 13 日）

著其行為的驅動位置，則這份意識是由什麼樣的脈絡產生？會如何變動？這些意識與身體乃至整個驅使主體所做的行動之間，有怎樣的串聯關係？

（三）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者們

陸生開放至今剛好十年一載，縱觀過去與陸生有關的研究，從研究者身份來分可分為兩大類：

一、以非陸生身份進行、立足於台灣社會發展而進行的研究，時間多集中於剛開放陸生來台的前五年，其中尤以王嘉州的數篇研究報告為突出，關注核心多聚焦於陸生的政治態度變化(王嘉州, 2011, 2012, 2016)；

二、以陸生身份進行之純粹「探索型研究」。研究方式上則多為排除了個體情感與觀察的量化問卷，或簡單的訪談對話。但在後幾年，則有更多的研究者正式將陸生看待為「跨境的具有主體性的學生」，而出現了具有「跨」色彩的文章：在體制適應方面，多數研究者都會提到陸生的尷尬身份位置，是一種不是、也不如外國人與本國人的地位(古曉婷, 2015; 陳彥潔, 2018; 羅曉妹, 2017), 張育嘉(2015)更直接在研究中運用「矛盾的再疆域化」(Contradictory Reterritorialization)以說明陸生在臺生活中會面對到因制度產生的種種劃界；在文化適應方面，趙一鳴(2018)認為陸生會有融合、分離、同化及邊緣化四種不同模式，還有人透過台灣重大社會事件為切入點進行分析觀察(周祝瑛 & 魯嬪文, 2016; 黃崇山, 2016)；而張可(2019, p. 98)的研究則在此基礎上繼續破除了過去認為的「來自威權政體下的陸生公民會被民主制度吸引」之偏見，更深入探究了陸生在面對劃界時的情感變化及其與赴台前意識形態的關聯，亦否認了兩岸互動中對於「理性人」的預設；但唯之不足是，以上所有論文皆為更深一層探究陸生的公共行動力，也未細緻的將陸生群體放在潛在污名身份下作探討。

「公共」(public)的古典詞義來源有兩處，一個是希臘字 *pubes*，即身體、智力、情感等各方面上的「成熟」；而另一個來源來希臘字 *koinon*，也是英文 *common* 的派生詞源，本義為「關心」。在當代西方學術討論中，Hannah Arendt(2013)以對極權歷史現象的考察為背景，從公民緣起開始討論「公共領域」(public realm)，並以「實踐」¹⁷為基底，透過闡釋雅典城邦的政治實踐與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來說明「經由言辭與說服，而不是透過力與暴力來決定的」這種行動成為人們溝通交流的可能，並認為少數特定男性在集市與廣場上自由發表演論的空間正是一

¹⁷ 在漢娜鄂蘭的書中，實踐 (praxis) 與行動 (action) 是交互使用的 (蔡英文, 2002)。

種「人履行其政治實踐的空間」，這種空間可區別於一般的、經濟活動的私人領域。在這裡，Arendt 是站在多元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角度分析行動/實踐區別於一般勞動 (labour) 與工作 (work) 的特性，對於公共領域及公共性的強調是一種側重在空間性的、具有可丈量的距離感；

但 Habermas 從 18 世紀至 19 世紀的歐洲¹⁸爬梳公共領域的出現與轉變時，強調的是另一個重點：人們聚集、參與、對話、討論而反過來形成了公共空間。最早是「希臘時期的公共領域」，發展到封建社會時期，統治者為標識特權則出現了「代表型公共領域」；到 18 世紀晚期，統治集團分裂出了具有公權力的機構與議會，布爾喬亞階級 (bourgeois) 則在沙龍、咖啡館與文學團體所在處創造了「文學的公共領域」，於焉過渡出能夠藉由文本、哲學批判與啟蒙的「政治公共領域」。如馮垂華(2019)所言，在這個時期中那些「閱讀及討論作品的公眾們」，實際上也在「閱讀與討論自身的問題」。這些公共領域的條件包括公共性¹⁹、溝通力、批判性意見等，即並非簡單的「非私人空間」，而是作為輿論主體的公眾能夠在場所裡自由參與公共事務、透過言談或出版來發揮批判功能(黃瑞祺 & 陳閱翔, 2018)。但至後來資本主義進程變得更加勢不可擋時，公共領域結構再度轉型、公私領域的界限再度模糊，「國家與社會交纏在一起……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所強調的自主性於焉消失」(Habermas, 2002)

在 Arendt 的體系中，公共領域是行動「演示」(performance) 與「施為」(agency) 的場域(蔡英文, 2002, p. 66)，意即個體對於公共事務的彰顯與討論方是這個領域之所以存在的前提；而哈伯瑪斯則認為民眾需要倚靠市民社會與大眾傳媒等力量才能使公共領域達到其本身的功用：成為民主政治的核心；近當代的學者們則大多不出這兩者所建立的對於公共領域定義的框架，或認為當代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核心便是公共領域中公民理性自主的互動(張錦華, 2001; 嚴佳音, 2015)，或認為公共領域介於國家機器與社會/私人場域之間的能夠令公眾自決的「論域」(尤淑嫻, 2005)；但同時也有研究亞洲公共空間的學者認為「市民空間」(civic space) 中人際網絡的簡歷能夠促發新的公共參與的可能(Douglass, 2002)，或認為公共空間的價值並不止於對公眾開放(夏鑄九, 2004)。研究當代西方民主理論的哲學家 Taylor(2004, p. 86)則進一步認為，公共領域是一種可以讓互不相識的社會成員一起加入討論的共通的空間 (common place)，使不同種目的在一個空間裡交織、

¹⁸ 主要在英法德三國歷史。

¹⁹ 在公共場所中針對某一個議題閱讀、討論並產生批判性意見的公眾，就帶有一種「公共性」的特質。

形成一個更大的「非集合性空間」(space of nonassembly)，所以只要人們能夠針對特定議題討論，哪怕是在不同時間、版面，也依然構成了一場公共討論；法國社會學家 Aubin(2014)則對「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與「公共空間」(public place)做更細緻的釐清，指出兩者在法語裡的詞源皆是「L'espace public」，放在分析語境中時會認為「公共領域」對應一種「能夠形成公共辯論的場合」，而「公共空間」則是「創造社會連帶之物理性空間」。而無論哪種定義，都圍繞著必不可少的「行動者」、「同在」(being-together)、「一種空間」進行「論述/對話/溝通」。

然而，隨著時代科技發展，所謂公共領域/空間的界限又受到了新的衝擊，這種物理性的空間維度逐漸被拓寬到光纖網絡的層面來，例如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繼承人的 Kellner(1997)就曾提出，網絡能夠作為一個嶄新的公共領域以拓寬公民政治參與，也有支持者認為依據網絡這種不受物理空間限制的傳播科技，能夠有望搭建一種不依賴於傳統國家的、全球性的公共領域(Beck, 1999)，這種全球公共領域還必須要承襲「普世性」(universality)與「平等性」(equality)兩種精神，才能使世界所有公民都能擁有參與討論的際會(Sparks, 1998, p. 112)。但儘管網絡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互動頻率，這兩種精神以及「理性」等基本要素是貧乏的(洪貞玲 & 劉昌德, 2004; Schneider, 1997)；針對這一點質疑，英國自由派政治學者 Keane 則否認「理性」與「共識」是公共討論的基本元素，認為 Habermas 式的以民族國家為公共領域範疇的情況已經絕跡，如今盛行的將會是互相交疊、支離分散的「馬賽克拼貼」式(mosaic)的複數公共領域，故多元、無控制權、無終極判准才會是一個公共領域的基本樣態。於是會有在地社區的小型公共領域，也有全國性的、跨國界的中型公共領域，還有大型的全球性公共領域，而這些形態的公共領域中，網絡將會是最適合的媒介載體(Keane, 1995, pp. 76-80)。

而不可忽略的是，當載體變為一種科技技術時，就會出現滯後於科技的「數位落差」，若不考慮具有落差的現實，則網絡就會成為「全球化資產階級菁英」的公共領域(Golding, 1996)。然筆者以為，在兩岸尤其是陸生與台灣社會的接觸裡，這種「數位落差」很少是客觀技能會經濟地位的問題，而是由「氛圍落差」引起的：過去已有文獻討論陸生在台的網際媒體使用狀況與偏好，發現會有一部分陸生即便能夠使用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等境內無法使用的軟體時，仍然會因為害怕不同資訊引發的衝擊、錯愕於不確定性而規避使用(湯甘, 2015; 黃亞楠, 2016; 楊柳 & 陳懷林, 2020; 葉乃靜, 2018)。

事實上，在 2014 年雨傘運動與 2019 年反修例運動中，連儂牆(Lennon Wall)的使用也成為了一種新興的「公共空間」。因為行動/實踐的原則「不是運用於自我之內在所形成的某種動機」，相反是來自於「外在的激勵」，可以「一再的被人行動所體現」，意義將用之不竭，而這種原則的彰顯便「唯有透過行動的實踐」方能達成(Arendt & Kohn, 2006, p. 152)：人之所以實踐的核心在於「彰顯」。且「無言之行動不再是行動，因為不再有一位行動者……踐行某種行動的實踐者要在他同時是一位『言說者』(the speaker of words)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Arendt, 2013, p. 178)即語言、行動都帶有某種「啟示」、「彰顯」的本質與義務，行動者在言行的過程中其實都在向「他者」彰顯自身的存在，其獨特性與那隱細入微的差異都需要「他者」的在場見證，於是得以互動——漢娜鄂蘭由此建立的關於實踐的互動論——構成了一種「彰示(彰顯昭示/啟示)的空間」(The space of appearance)。

以及，在閱讀 Habermas 對於公共領域歷史的追述時，會發現書中對於公共領域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排他性」的問題直「面」而不「談」，這也導致後續一些研究者引述公共領域概念時，一樣會強調「知識分子」的必要性(嚴佳音, 2015)。然知識分子/精英在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作為聯結與實踐、批判與啟蒙的實踐者的同時，總是難免、永恆的會遇到學術圈內象牙塔、知識資本壘疊難攀的狀況，這種排除底層的前提令多元認同所能凝聚成的反抗空間可能降低，涉及公共領域所切實影響市民利益的決策層面時，顯然人並不平等。當代學者 Fraser(1990)便對此現象提出了「底層公共領域」(subaltern public sphere)的概念，意圖推翻、打破 Habermas 這種具有父權意識形態之公共領域的定義²⁰，將聚光燈打在邊緣群眾上，令女性、勞動階層、弱勢族群的公民都能夠發聲；對此 Fraser 還釐出了「強公眾」與「弱公眾」的分類：前者會在自治組織中決策、形成可與國家對話甚至抗衡的民意，而後者是那些無法參與決策的、常會被排除、被代表的群體，那麼要如何使「弱公眾」進入到「強公眾」的思考討論中，令這些外在於議會等自治行政單位的社群民眾能夠實踐自身的權利體認？

於是我們可以透過以上的討論，根據空間性質(物理&網絡)的分類，找到在台灣社會中具體的公共領域之處：

²⁰ 在 1990 年代，Habermas 在多方的挑戰與質疑聲中再討論公共領域時，就有反省檢討原初書寫公共領域時的排他性，並認為被排擠者本身也有能動性。

- 一、 沙龍/讀書會，也是最接近 Habermas 傳統型公共領域定義的地方。
- 二、 公民社會活動（遊行、集會、社團等），因為這些活動能夠出現本身便是圍繞著特定議題做討論與行動實踐，其話語框架與意見生成都是具有「共同空間」的存在的，所以能夠看成一種特殊的公共領域來看待(馮垂華, 2019; Taylor, 2004)。
- 三、 NGO/NPO 組織，尤其科技發展以來各 NGO/NPO 之間能夠藉由網絡做跨區乃至跨國聯結，推動多元議程、資訊交流與政策宣誓；內部也呈現著更豐富的組織架構層次(洪貞玲 & 劉昌德, 2004)。
- 四、 線上的聯署/小組組織，即新時代依託網絡媒介出現的公共領域，明顯的例子是 2020 年以來方才成立或開始受到關注的「境外生權益小組」、「在台陸生推動小組」等。
- 五、 連儂牆，能夠透過書寫、張貼、昭示的方式喚起人們對於一個特定議題的注意與討論，是近十年於兩岸三地興起的新型「公共空間」。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主要採取半結構訪談、參與觀察等方法，綜合探究以下幾個問題：

- 一、 會有意識的對口音進行隱藏或保留的陸生，其行為動機為何？這類群體有無可分類、化歸的對應特性？
- 二、 在這類陸生進行口音行為展演 (performance) 的前後，與日常生活中與人交往、參與公共行動之間有無任何身體體驗上的聯結？
- 三、 身為潛在污名者在參與公共領域活動的過程中會遭逢哪些經驗？在這之中又如何看到、發現或塑造出主體性？

(二) 研究方法

因疫情影響，筆者無法返台與陸生們具體面對面接觸，故將會根據情況對無法見面的陸生用電話訪談的方式，用半結構訪談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先請受訪者看過訪綱、並簽署訪談協議與保密協定，再在一對一的交流中透過彼此之間的互動帶出想要討論的內容，循序漸進地引導受訪者觸摸到議題，並針對特定的議

題（如六四三十週年、香港反修例運動、2020 新冠疫情）加以探討，這些探討涉及到一些態度上的細微變化，故筆者將同時觀察對方的語氣、神態藉以了解其經驗與感受，決定後續問題的走向。研究對象的受訪時間定為 30-60 分鐘，訪談將圍繞著「社會生活狀態」與「公共領域交往狀況」兩條主軸進行交流，在徵求受訪者同意後（見受訪者同意書之附件），會將訪談過程中研究內容相關部分錄音並謄錄為逐字稿；在訪談之後會結合之前所有社會觀察，通過逐字稿分析以詮釋口音展演行為在陸生身上的體現脈絡，理解本應該、也被期許著作為「兩岸交流大使」的陸生何以緘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意外加深了兩岸對立的現狀，再站在批判導向，希冀此行動研究得以解放、改善現狀。

除了訪談以外，也會對受訪者的社交媒體（微信、Facebook、Instagram 等）進行文本分析，與文獻回顧一起形成方法的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整體研究過程中，將會與污名等概念對話，不斷進行「訪談-分析-追蹤觀察-再分析-修正定義」的螺旋步驟以達研究結果。

（三）樣本選取與說明

介於在文獻回顧中已闡明之對於公共空間、公共行動力的定義，本次研究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將會滿足以下幾個條件：

- 1、 來台就讀非交換型學位之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除港澳地區）
- 2、 在任何一種公共領域（詳參第三節末尾對於公共領域的五種分類）中行動的人，按照廣義的行動定義，將包括組織者、參與者、深度觀察者等。

本研究訪談對象共 17 人，2 位博士在讀、7 位學士學位或學士在讀、及 8 位碩士生，來台時長從最短兩年，最長九年。陸生並非為扁平單一的同質性群體，本應當考慮的分質變項會涉及就讀學院、家鄉是否為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經濟特區的延伸）、留學時長、來臺意願是否自願等，但這些因變量的影響效果基本已在前述相關研究中得到過驗證（王嘉州, 2011, 2012; 張育嘉, 2015），加之本研究的研究內容偏向主觀認識上的判斷（如口音隱藏與否的標準需要藉助外界評論輔佐判別），在八千多的陸生群體裡，能夠擁有學習、轉換在地口音的群體並不在少數，但通常也因為他們的交友圈常游離於陸生群體之外而隱形難識；故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將會有意識的透過筆者之日常觀察（如研究對象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在社會運動中的出現頻率）來篩選那些滿足第二條要求的陸生，在附錄中

也都將附上筆者選取該受訪者之判斷原因，通常選取對象的特質會為行動力強、可見度高。尤其在此次（2020年）新冠疫情的重大社會事件影響下，兩岸在政策上的隔空打拳無不左右著陸生這群「政治牌」（NGOCN, 2020）的命運。儘管「兩岸夾心餅」被巨大的政治力量與制度框架裹挾、囹圄在逼仄的一隅，但仍出乎意料地展現除了陸生空前的行動力：1/26日，台灣教育部出台了帶有歧視性的《隔離工作指引》，兩位世新研究所的陸生迅速在隔天組織了第一份「陸生聯署」並引爆整個陸生圈，至其截止日期時收集了近千份簽名——在陸生群體誕生的第十年，這是最快有所響應、最大規模、最多人參與一項對焦公共領域的集體行動。

後期疫情持續燃燒並蔓延至全國、全球，（無論是否有歧視的）隔離政策被更新為「禁止入境」，跨境的合法程序被按下暫停鍵，但陸生的行動卻仍持續、甚至轉為更隱微而堅韌的運作：三位研究所應屆畢業生創辦了「陸生返台推動組」，力求以溫和、理性溝通的方式與台方對話；一位台大研究生與輔大學士生則一起創辦了「各校陸生負責人群組」與台學聯搭建溝通平台；除第一份針對隔離政策的聯署之後，後續又出現更多的聯署，其征召對象從陸生擴展到台灣在地 NGO 團體和學校教職人員、對話者則從模糊的「台灣當局」細緻到教育部、行政院乃至各學校校長。在這個過程中筆者逐步接觸到了在關注並予以行動支持事情進行的陸生，並以滾雪球的方式也陸續接觸到了在新冠疫情之前便有在台灣公民社會參與社會行動的人。

在與這群人溝通的過程中筆者了解到了不同類型的陸生，一方面驗證之前大部分陸生論文裡便有提到的「陸生是一個異質性群體」的觀察，另一方面又再度深化、細化了其「何以異質」與「異質以何」的探究：前者是指造成不同陸生面對類似境況有全然不同反應/行動類型的原因，後者則是那些原因及行動方式又如何反過來作用在台灣社會及他們自己的身上。

第二章 跨境之前：想象與重曝

(一) 為何跨境

在探究跨境生的公共行動力及其社會生活之前，應先確認「為何跨境」。訪談結果發現，這群具有一定公共領域行動力的陸生「為何跨境」的原因各異，但大致可以分為主動跨境與被動跨境兩大類：主動跨境的陸生常具有慾望、受好奇心驅使、帶有目的性的來到台灣，最能直白辨別的一個經驗是曾經主動的查閱與台灣高效生活有關的資料，或曾主動嘗試聯絡相關的資訊源以達到了解的目的；而被動者的來台讀書則相較而言是一種可為之亦可不為之的、受客觀條件限制、無特別目的的情境選擇。

在主動跨境者類別裡，陸生的慾望與目的常會聚焦在對於某種特定社會氛圍的想象或好奇：

一個是我本來就蠻喜歡臺灣文化的，看電影、看書；然後工作的時候有接觸一些臺灣人，所以就蠻喜歡的；然後加上我的專業，我有認識比我高幾級來這邊念書的，因為我們是同專業的，他就跟我分享覺得臺灣在這一塊（教育學院）做的蠻好的。然後再加上大陸考研就很可怕，要考政治、又只能報一個學校一個專業，很反人類，然後教育的一些方向跟我想像也不是特別符合，同時也很想離開一下我家鄉……還有別的一些想像就是民主自由的氛圍，可能對文化交流的想像會多一些。（QP-3）

我來之前是覺得台灣是中華民族的最後一片淨土。（Q：最後一片淨土是指民主制度嗎？）是的，我對政治哲學感興趣。（XP-3）

台灣性別運動搞得不錯嘛，而且大陸沒這個系所，再加上想換個環境……然後之前來過一次台灣，印象挺好的。（XP-3）

首先是因為我們高中當時是比較早期做模擬聯合國或者國際會議的，然後我有參加，練習「中國教育論壇」就是會變成什麼各省份都有代表，當然是不存在這個東西，但是因為你牽扯到各省份代表就一定要把台灣也納進來，我剛剛好分配到台灣，因為這個契機就會去查一些台灣的高校政策，對台灣的高校有一些了解，後來高二高三的時候，其實都會留意台灣這邊的招生情況……真正決定要來，是因為我當時有決定要念社會科學；另外我來那一年，其實2014年有爆發318學運，同一年中國的社會環境

已经开始收紧了，然后一些东西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空间，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想说那来台湾看一看，台湾这边还有人冲进立法院，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就是说它代表着某种社会的行动力活力這種東西。(YP-)

由上可見，這種想象的社會氛圍可能是基於政治哲學上的民主制度及其延伸的特定文化，如走在亞洲前線的性別運動，或相較於中國/大陸的藝術自由與公民行動；而另一個有意識的選擇來台灣的分支，則可概括為是出自於對自己學業清晰規劃的理由，方將台灣納入人生計劃的一部分：

因为我高三的时候想要念大学的科系是餐饮系或者西餐系等等。所以在大陆其实有系的学校大部分都可能是技職（技術職業）类的学校，如果去像是欧洲，可能法国或者瑞士等等，包含酒店餐饮管理或酒店管理，大部分都是提供副学士学位。所以只有台湾的学校，像高雄餐旅大学會有提供学士学位的餐飲系，这就是我最初去台湾念书的目的。(SU-4)

當當時有發現到臺灣的研究所還蠻有趣的，他列的清單裡研究所的名字都稀奇古怪。也不是稀奇古怪（笑），就是他們很多樣，還有一些分支特別的細，或者是和大陸那種傳統的「大學的時候你有哪些專業、研究所就差不多對應哪些專業」的情況不一樣，不會那麼制式和死板。而且我原本是念文科，當時申請研究所的時候，我有考慮幾個方向，都是原本學科的分支，當我在考慮比如說申請香港或者是國內考研的時候，我都會考慮這種類型的專業。但是等我想要到臺灣的時候，我會覺得說既然他的專業這麼開放，我可以試著比較跨一點出去，不是那麼在自己原本專業的東西。總之我因為臺灣的研究比較多元，可以來這邊轉專業。這一點至少我當時看起來覺得，好像比較符合我對於學習的想像，不會那麼限制在一個單一的學科裡面。(ZP-5)

至於被動跨境者的類別裡，正如過去一些論文所提到的，大部分會因為諸如物價低、升學容易、語言方便等（尤其是與出國及留港相比之下）就學環境上的優勢而選擇台灣：

机缘巧合加上阴差阳错。我一开始说实话，我压根没想过要去台湾上学，但是因为我没考上北京的学校……当时我就在想有没有不需要语言的地方又能继续升学，这个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中国香港还有中国台湾。因为我不会说粤语，然后就上台湾了……在2018年的时候的我对于台湾的未知能未知到什么地步，就是我甚至不知道台北在台湾的什么地方，我也

不知道台湾有个台中，我只知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小島叫台湾省，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HP-3）

因为我大舅是当年国民党的士兵，去了台湾到00年的时候才相认，才知道在台湾有亲戚，然后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提议说让我去台湾念书，台湾那时候也是有优惠政策的，分数偏低。我就去了。（FU-3）

（二）不能準備的衝擊

大部分在被动情境下来台湾的陆生通常都只能摄取到对于台湾非常表层的资讯，过往研究裡经常会认为是这样的「教育」氛围成为使陆生在台湾有过多冲击与不适应的重要原因，其中那份不适可能会体现在不同社会制度（广义上的威权与民主）之间的日常生活运作与氛围；但本研究发现，事实上主动跨境与被动跨境的不同前因对于其跨境之后受到的冲击或「重曝」结果却没有过多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即便是做好了「充足（学术性）准备」、在一中脉络下仍培养了对于统独议题的高度认知者，依然有可能落入跨边界时带来的对于脑中画面曝光的重新调整，而这样的冲击也恰恰体现在了两位对具有特别意义的台湾民主运动有特别关怀的陆生 Q 与陆生 Y 身上：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台湾正好是太阳花，当时又有很多教授来北京做讲座，所以我当时以为我对台湾了解的很充分了，尤其我还找了很多九〇年代运动的一些资料之类的，包括他们长期的统独争论。但是我那时候是一个愚蠢的左派，所以就带着一副……你知道现在台湾左派会有的那种想法来台湾……就是基本上我是认同他们的。但是来了之后发现他们讲的跟看到的台湾是两回事。我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而是他们的研究现在在大陆受到的欢迎比在台湾更多，他们在台湾被边缘化，但我又是被他们的边缘化吸引来台湾的，所以导致我来台湾刚到的时候看到的東西跟我在书上看到的很不一样……简而言之我来之前对那些统独议题我是很有准备的。（你的准备具体是什么？）我来了之后我已经知道大部分台湾人都是跟中国人持有不同立场的，然后台湾的爱（中）国也完全不多，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殖民地历史啊之类的……当时我看的比较多是学术性的论述，所以我觉得我是做好准备过来的，但是到了台湾之后虽然大体上跟学术性的研究基本一致，可是我看到了一些尤其是左派论述裡看不到的东西。（我：比如说？）嗯……我觉得有点难概括。我想一下……我觉得那个偏差可能来自于当那些台湾的学者到中国去分享太阳花以后的

經驗時，通常是帶有批判性的視角，比如說他們當時蠻重要的討論是在太陽花裡體現出來的階級性與主體性，關於台灣的。然後那個時候我在北京我看到那些論述時我非常認同，以我在北京所了解的知識來看，我覺得太陽花很可能是個民粹主義的現象，然後他們也不了解中國，他們只是盲目的討厭中國。當然這跟台灣自身的歷史經驗有關。但我在北京所了解的是，這種論述對於大多數學界是沒有啟發的，而且這種論述在台灣是邊緣的。但是當我到了台灣之後我發現他真的是邊緣的（笑），那個落差是這個。（QP-5）

应该说我一开始对 318 还是有距离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是觉得这是有趣的，或者是值得去观察去研究去思考去学习的，但这是对旁观的态度而已，如果你自己进到其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就会变成另一个层面的事，但是我在来台湾之前其实会对后面这个东西有预期，会有一些心理准备，比如说我来之前其实会想说这群「凶暴」的台湾人会不会想殴打陸生……对，以前会有想到就某种心理预期就做到最坏打算，那个时候想象是很多的，可能你脑袋里会有 100 个台湾的版本，有非常好的有非常幽默的，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对不对？但是之后我觉得不是這樣的，因为我来台湾之后很快就加入校园内的異議性社團，318 結束以後那些当时的参与者都回到校园内去做社团，一些印象当然就会更具体，就觉得说好像学生其实很温和（笑）。（YP-7）

且同理，在本研究中發現與過去所認知一些「天然統」在來台灣後必然會與「天然獨」相遇並摩擦的論述恰恰相反，他們恰可能具有某種「隱匿」的特質，「避開」了一切有可能的紛爭；而這類陸生的「隱匿」事實上是在將社會分塊、切割之後所鞏固的一種認知，尤其將政治或者代表政治的政黨與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作區分，並在區分後的經驗中生活：

印象也就那样，就没有什么特别改变的，觉得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挺好，政治原因不谈的话，其实同学私下里都是挺友好的。（FU-3）

我覺得要分開來看，就是臺灣民眾和臺灣政府，特別是經過疫情事件以後要分開來看。（XU-3）

一方面這樣的區分可以深入討論甚至打破國族、政黨與人民之間容易被建構的牢不可破的關係，但另一方面這種區分也是過去中國高度「去政治化」環境下所習得的——儘管「去政治化」便是一種「政治化」——一種是經歷過天安門

事件甚至是十年浩劫的長輩們常告誡子女的諄諄勸導，政治是不堪的、可怖的污穢；一種或許是對於「落後就要挨打」的恐懼，故而擁有對於「祖國統一昌盛」的殷殷期盼，政治（在這種語境裡尤其直指民進黨）都是阻擋「歷史必然進程」的滾石，不可靠之過近以免「玉石俱焚」。

過去會認為，當環境發生重大變遷，例如一個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的興起時，非常有可能使人民的政治認同、文化習慣與思考方式發聲巨大的改變，於是這種與過去不接續的社會化過程被稱之為「再社會化」（高墻華, 2000）。在社會階層與現代國界之間的移動者是最有可能經歷再社會化的一群人，若將目光放在兩岸三地裡，在政治框架大相徑庭的前提下，陸生的再社會化可能性則將高於港澳生（黃崇山, 2016）。而對於這種「再社會化」的鮮明例子，莫過於受訪者 LP-9 所陳述的關於「獻祭」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論文裡寫到過，陸生深入台灣社會的過程其實就是「獻祭」自己的過程，要獻祭掉自己曾經一腔熱血的愛（中）國情感、獻祭掉自己與大陸的聯結、獻祭掉自己的過去……我到現在已經無所畏懼了，因為我幾乎都獻祭完了。（LP-9）

所謂的「獻祭」，即讓一個活生生的、帶有過去鮮活的生命經驗與鄉土記憶的主體，在進入到一個新的社會環境時，因為觸碰到了矛盾的法律框架與社會地位（介於台灣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歷史遺留位置），而在日常交往過程中重新思索自己的政治認同（「一腔熱愛的愛國情感」）、文化習慣與思考方式（在原鄉中的一切聯結）。而在這種光譜中，最顯著的例子大概就如受訪者 LP-9 這般，完成的幾乎是一種重生性質的再社會化。同樣也可以見得，兩岸在地裡空間上即便只有一水之隔，卻也正因此才使彼此之間的想象變得霧氣蒙蒙；再加之中國防火牆對牆內訊息世界的壟斷、媒體上有選擇性的宣傳報導、學術圈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自然阻尼，都會使得所有社會空間上的位移充滿不安與流動。那麼在歷史、科技、治理技術等多重維度之間所搭建在兩岸上的矩陣型框架裡，這群常受到衝擊的跨境生是如何生活的？在這種生活的過程中，是否會有一些獨特的經驗、在過程中「成就」/「成為」了陸生？

第三章 污名語境下口音的「體現」

(一) 污名下的口音意識與展演：認知與回應

跨境生因為赴台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在課堂中與台灣師生的混類接觸 (Mixed Contacts) 是最常見的一類狀況。在這種狀況裡，不確定性幾乎充盈於任何一種言行的角落中，儘管一個不熟悉的、陌生的口音在環境中總是「擲地有聲」，吸引各式的關注方式都已是相當自然的一種樣態，然這樣的「自然」卻會在特定族群、特定社會時空環境下產生更豐富的經驗；而對於這種無法預知的不安，多數陸生並非天生知曉，乃是經由親身經驗被迫習得的：

我就在我们学校修了一门课，那门课叫两岸关系与国际政治……然后有一次我就中签 (筆者註：被抽到學號) 起来回答问题，然後一開口就会有人回头来看我或者什么。然而我的做法一般都是以微笑去回应，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他们转过来看，可能更多的是好奇，就是说这个人跟我们长的一样，说也是黄皮肤，他为什么讲话怎么是一个我完全没有听过的那种口音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我都微笑有去给予一定的回应，然后在我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然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个台灣人，他非常严肃的问我「你是哪里人」，然后每当台湾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時候，我都会很肯定的告诉他们，我说我是北京人，然后同学就接下来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他就直接问我「你是间谍吗？」(笑) 当时其实我大概愣了差不多也就半秒钟，因为你去想在当时的大环境那门课叫两岸关系与国际政治是这样子，然后那门课的老师他是比较轻松的，他对于大陆比较友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老师，老师是台湾人，她比较轻松，但是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并不疑惑，他是那种非常肯定的去问我，甚至于他问的问题，好像他已经有答案了：你确实是间谍。然后我当时给他的回复是这样子的，我也非常肯定的告诉他，「如果我是间谍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问出这个问题」，然后对话就结束了。(HU-3)

所謂「間諜」的印象，恰是兩岸「一邊一國」²¹的特殊歷史脈絡下，最特殊也是嚴重的敵對想象；且這種印象與國族/政府/政黨的捆綁之緊密，也可以由幾乎只有北京口音擁有者才會遇到類似尷尬境遇的情況中看出。且因陸生與台灣主

²¹ 中華民國 (1912)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流社會人群的外貌幾無差別，故對於這群同膚色的跨境者來說，在台灣社會裡與人交往過程中最能夠顯現身份的時刻除了在課堂上老師的「幫忙揭露」（「我們班上有中國/大陸同學」），幾乎只能是口音與用語帶來的，故受訪者 HU-3 便因為自身濃厚的口音而從「可貶者」的身份暴露成了「明貶者」，要開始應對因為受損身份在這個場合下刺激出的疑惑、不解、針對與惡意；但更多這種暴露與轉變會應對到的、更常見的敵對想象，則會體現在日常交往中的對話裡：

剛到台灣的時候大一上參加營隊嘛……當時不知道是講到一件什麼事情，講到中國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事情，然後突然有一個女生平常關係還蠻好的跟我說，「我不想跟你談過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倆的立場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我都還沒有表達我的立場，也沒有表達我的看法，他已經先預設了我的立場，然後預設了我的想法，然後他就已經把我放在他的對立面，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還蠻震撼的，因為那個時候剛剛去台灣。（XU-3）

受訪者 XU-3 則更在啞口無言的狀況下被迫默認了身份污名。於是陸生藉由口音開始意識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一種「想象的陸生」在這群跨境生踏入台灣地區、與台灣人接觸伊始便縈繞、糾纏在他們的生活中；在這裡，口音是媒介。而認知到這般污名經驗的陸生，就會對此產生認知與回應——無論是投入台灣公民社會還是選擇保持距離者，在與台灣人的交往過程中都不約而同的提到了最不喜歡與最抗拒交流的類型是「咄咄逼人」、「來問我大陸問題時已經有答案了」、「好為人師」、「不是交流的心態」、「孺子可教的感覺」。在陰性身體經驗與處境中，若女性能夠自由、主動、大膽的向外舒展運用自己的身體，幾乎就意味著「邀請別人客體化她」（Young, 2007, p. 72）；而還未開始舒展、還在運用自己的視力與聽覺感知新的環境氛圍的陸生，卻已然被定位在某個想象的位置上了——污名的矛盾情境使陸生對自身的自我意識與實際現實之間產生了距離，當越來越多的陸生觀察到這樣的現象，或本身就帶著不太濃重口音的他們在進入台灣社會生活時，便會逐漸意識到或許可以依靠切換口音以換取、躲避、擁抱著什麼，於是，口音成為了工具：

（Q：會有切換口音的時刻嗎？）有啊，尤其是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我會稍微控制一下我的口音。害怕被認出來啊，多尷尬啊。（HU-5）

（Q：為什麼想學台灣口音？）尊重他們的文化，尊重他們的口音，然後並且去學習，我覺得這樣子可以增進他們對我們之間的好感。然後另外一

方面是像我之前说的，认识到台湾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民众，他对大陆人士存在着一些偏见，或者说更严重的说是有歧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为了我在潜意识里面，我会对于大陆的身份，我觉得在台湾能隐藏就隐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是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我学台湾口音的另外一个原因。（ZU-4）

如果我上课被提问的话，我是不会讲东北话的。（Q：是怕被注目吗？）
对。（FU-3）

因为大部分时间是不太想被认出来的，一说话你就知道，他看你的眼神就会不一样，就会知道你是大陆的要多多看你一眼，这种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好奇，但是我感觉是不舒服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能不讲话就不讲话。所以来台湾读书以后变自闭了。（XP-3）

「隱藏」本身便代表著調適、一種無意間向同一情境內的他者施加的道德要求——如 Goffman(2017b)在符號象征論中提到的概念，人們在人際交往時，互動溝通等行為皆是建立在對於符號的運用與解讀基礎上，此時便會有「角色扮演」的考量。依其所言，陸生的角色扮演便可能被社會期待所限定，能否扮演好陸生這個角色，即看其能否得到情境場域內他人對此符號的看法、期待與立場。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便是在交往中希望表現的自然、創造出一種自己定義的情境——或許會因為害怕被聯結上政權的想象（現代性發展緩慢的事實），對於因為政治產生的污名標籤會做出一定的反應(Goffman, 2017c)，於是便發展出了兩個極端：（以口音為例的）藏與不藏。

作為可貶者的可切換口音的他們，是以一種受污名主體出現在某一具體情境裡，這時若要概括化他們對於「缺陷」的應對模式時，與其用暗示著可以更好生活的「能力」一詞，不如替換為最不為人知的「煩惱」——擁有對口音進行調適能力的陸生，常常需要考慮是否要展現、揭露自己的陸生身份，以及需要考慮在何時何地何樣的氛圍裡表現——在進入到環境之前需要做提前策劃、在離開環境以後更需要保持審慎的思忖以更好的應對下一次的進入，這些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判斷與擔憂，這也一樣使得許多陸生意識到：口音即政治，而口音帶來的身份焦慮則來自於台灣社會中各交織關係的邊界總和。

這種希望「增進好感」、避免麻煩（與注視）的渴望，即指向了對能夠隱藏、使自我隱形的期待，是來自社會環境結構下的無形壓迫與討好；或許是為了表示

陸生與臺生之間是一樣的：因為陸生的這份自我對民主也有想象，對自由亦有熱情，故彼此之間並無不同，故在希望參加一些公民社會活動時也能夠以一種被接納的姿態出現，不然「多尷尬」；亦或許是單純為了「進入」——凡是有標榜「禁止進入」的地方，無論個人背景為何，但凡有人出現在該場域中，即顯示了其動機：想進入該場合，或想要隱形的進入不被人發現(Goffman, 2017a)。而在日常人際交往中，幾乎任何一個情境中都可以有「禁止進入」的標識，其禁止的對象或許為現代性發展有落差者，放入現有的討論中即不夠民主自由、不夠重視人權的代表——捆綁在陸生身上的政治想象，令這群人在臺灣這塊獨特的歷史場域中受到了一定的拒絕。這些陸生們，或許便是在意識到「禁止進入」、意識到彼此差異時，選擇透過口音的方式展演自己的認同、表達自己的訴求。就在此時此刻，陸生身份進展的「扭轉」(twist)出現了：吸納、挪用(appropriation)、學習新文化中的特質，「創造出屬於他者特有的雜糅化(hybridization)」(謝瑤玲, 2009)，於是這份獨特的專屬於他者的自我特質便會超越了過去所有對於這之間雙重異鄉人的標籤與解讀。

除了想要消融自己的口音以融入社群的回應以外，還有一種展演的類型是保留。前文已討論過，多數陸生對於口音的有意識控制通常都是選擇消融或消聲，以期待不會有疑心與過多的注意，試圖透過這樣的身體展演以營造一個更柔和、更容易融入在地社群的形象——這對於一般跨境生甚至任何一種在疆界上移動的人群來說，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有利的。然而，在受訪過程中也發現好幾位多具有高強度行動力(參與社運、擔任遊行志工、在公投或大選之類的政治活動現場與人交流)的陸生仍然保有自己濃厚的鄉音，但同時也能擁有數位交心的在地知己，並對之前所作「口音帶來融合」的假設提供不一樣的思考方向。若基於有能力且有意識的保留口音類型出發，這裡的陸生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性格友善的隨和型：

(對於口音)我都一直很順其自然的……我覺得如果是交心的話，可能有2~3位這樣子，對，但是玩的好的很多也對，玩的好的很多，因為我是那種儒雅隨和的(笑)。(HU-3)

我是山東人我在廣州兩年就一點都沒變，在台灣也是，回去一點也沒變，可能我語言能力有限嘛。比如我在廣州待了兩年也沒學會粵語(笑)……交心的啊，有，其實我跟他們關係都很好。也可能讀的系所的關係吧，所有人都很友善，願意溝通。(HP-3)

我不會特別介意口音的事情談，也沒有特別想過……我覺得交往過程中大家都是去國族的狀態比較好，如果真的有好奇想問我我才會特別去解釋。（YP-7）

第二類的出發點則是以口音作為一種認同的實踐方式，無論是以原鄉口音作為族群或家國認同還是以特殊的一種身體特征作為性格認同：

但是對於我而言，可能跟我自己有關，因為我可能會覺得我的北京腔我會比較驕傲，或者說是我會比較自豪，所以說我沒有說很刻意，或者說也沒有很想去學台灣人講話，就是我可能會瞭解一下，但是你說我完完全全按照他們講話，可能我心裡是不願意的（Q：所以你的心裡不願意，是因為你對於你的北京認同比較強烈？）對，我會有一種地域認同感，然後從心理學上講，這種地域或者說國家或者說民族的這種認同感，完全是當你離開這個地方就離開你所生活的那個地方，人都會萌生出來的一種認同感，當我去台灣的話，我也會有一種北方人的認同感是這樣。（HP-3）

整體一開始感覺不太 nice，好像你跟別人都不一樣，但是這個事情跟我專業又相關了，藝術學校的學生普遍都比較有個性，他們不喜歡跟別人完全一樣（笑），他們其實是非常推崇你要有個性的，你要跟別人不一樣，反而這點在一直還比較吃香，覺得反正我跟你們不一樣，我做什麼都可以，好像自己賦予了自己這麼一個特權的感覺。I don't care, I don't give you a shit（笑）。後來習慣了之後就覺得沒什麼關係，大家就是不一樣。你不想理解我或者你不理解我，那是你的問題，但我是非常開放的，我是想理解的對吧？（LP-9）

第三類則是以口音在污名語境下的體驗，反過來坦然接納並以之為生活擇友的準則，或是在相對寬鬆氛圍下一種特殊的享受：

我一開始會刻意隱藏，但是到後來覺得太累了乾脆就不管了，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因為我的口音一聽是大陸人，就不跟我交往或者對我有一些想法，那是你的問題。（HP-5）

我上課時候去前面拿話筒講，那個時候從他們看你的眼神，從手機挪到你的身上，你就知道你好像是有點特別的。（Q：你享受嗎？）說實話，有一定程度上是有享受在其中的，因為他們沒有對我有任意的不友好，這是前提。如果他們對我不友好的話，我肯定不會有任何享受了。（HU-3）

我一開始會在意啊，會學（台灣口音）啊，後來覺得我去他媽的。如果一個人，因為我的口音就怎麼我了，那這個人不要接觸也罷。（LP-9）

最後一類也是最特殊又最能體現陸生主體性之營造的一類，即開篇在研究緣起中所提到的友人，她在一些情景中進行故意的台灣腔之模仿，從而得到一種「惡作劇般的快感」。這點近似於 Goffman 在污名概念中提出的「落差」與「反彈」：受污名者所具有的的虛擬身份與真實身份之間會有落差，而當社會環境強加一種身份給受污名者（例如陸生就是來自威權國家、被洗腦的粉紅）時，這種篤定有時便會因為受污名者的「蒙混通關」（passing）而反彈到一般人身上，會反被受污名者證明「正常人的愚蠢」以及「所有讓正常人認為他與他們有別的理由都只是合理化」（Goffman, 2017c, pp. 159-161）。這種喬裝打扮有時僅僅會單純為了好玩，例如「惡作劇般的快感」，或許也因此能夠令自己同時具有「進入或脫出受污名的類別」的雙向能力(Goffman, 2017c, p. 157)：

我有一次帶活動的時候，隔壁大叔突然聊到自己以前是台商。然後我就好奇問他那後來怎麼不做台商了，他說「中國人都被洗腦」，當下氛圍就很尷尬……因為大叔沒聽出來我是中國人，但跟我一起辦活動的小夥伴是知道的，他們都在偷笑。我就多嘴回了一句試探一下說「沒有吧，是政府的問題啊……」大叔又斬釘截鐵的說「不是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之類的。我當時很傻眼，有點想直接戳破他「誒可是我就是中國人但我還在給你辦人權活動誒」，但想想覺得很好笑很尷尬，就算了。蠻妙的。（HU-5）

除了以上討論之幾種對於口音選擇性的行為展演類型，還有一種陸生常見的情境也值得討論。在污名概念中，受污名者些微的缺點或是偶然的差異舉動，常常都會被簡單、再度劃歸為污名者的某種「本質性」的特質：這幾年民間青年、左派陣營顯然對於「台灣主體性」等議題有相當基礎的共識，然這種共識在詭譎的兩岸歷史脈絡裡卻逐步、便會合理自然的加強了「反中」立場，單陸生開放這十載來可以表現出這種立場或「亡國感」的社會公共事件就有：三一八運動、金馬獎傅榆事件、反紅媒大遊行及反送中大遊行等；故接受「一中」教育廿年的陸生群體在這樣的台灣社會裡是容易走散的，他們是台灣社會裡的偏差代表（deviance），是對整體社會秩序進行集體否定的人：「來台灣呼吸自由的空氣吧！」「過來學習一下民主社會是什麼樣的！」類似的話語常常充斥於網絡與民間的日常生活中，而這些都無不表現著整體台灣社會對於陸生與中國政府/政黨

綁定的緊密聯想。筆者已在文獻回顧裡說明，跨境生並不是跨越疆界、來到台灣之後便能立刻學習吸收新的文化模式，更難以直接轉為認同；而這群與台灣文化相互抵觸的陸生，在現代性中長大的台灣社會眼中，便是一種「對自己更優秀的人表現出公開的輕蔑」，代表著整體「社會誘因系統的失敗」(Goffman, 2017c)。有許多受訪者都提到遇到了不少希望與他們「對話」中國政治或現代民主概念的台灣人，但多半的受訪者都認為這「無法對話」，認為台灣社會很難知曉受污名者或沉默或逃開或拒絕的行為背後，那些掙扎、彷徨與許多的難言之隱；反之會被視為「被洗腦」的本質：

他們就帶著一副「你們中國沒人權」的想法過來講話啊……我知道沒有啊！但他們……沒有要跟我溝通的意思你知道嗎，就是那種說定了：你們沒有。然後走掉！那到底有什麼意思？(HU-5)

就你知道男生都比較白目，然後他們就自認為跟你很熟，開始問你什麼習近平這種維尼熊之類那種問題，我是真的完全不想理……但是他們可能就覺得你們不想跟他們談啊，你們就是威權啊被洗腦啊什麼的。(XU-3)

在諸如這些狀況常常發生以至於成為某種社會事實時，受污名者會夠透過過去的經驗與社會觀察而一定程度上的知曉自己將要發生的狀況，並對之做出反應；其中最常見的反應就會有「防禦性的畏縮」、「虛張聲勢」、及在兩者之間搖擺的狀態(Goffman, 2017c, p. 16)：

(Q：來之後還會有遇到不願意跟台灣人談論起來的話題嗎？) 不會談……因為我一直還蠻好奇台灣人他們的想法，或者他們想法的轉變之類的，所以一般如果有這種(統獨)話題我都會很積極地加入，還會挑釁他們(笑)(Q：與台生互動過程中會對自己的想法作保留嗎？) 我會談。我還蠻經常不說我的真實想法，因為我自己想法也會轉變，像一開始我一直覺得獨立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或者說他們完全不可能獨立的——這是我一開始的想法，剛來的時候。但我知道一旦我這樣講的話那個天就被我聊死了。而且我一直覺得政治立場不是很重要，人品什麼的比較重要；而且我很常接觸到一些支持統一的人，尤其是一些前輩，跟他們聊天的時候我也不可能很明白的講我對大陸的批評。(QP-5)

「挑釁」便是一種典型的、結合了「防禦性的畏縮」與「虛張聲勢」雙重特點的行為，故意越過有一定限制的界限但又保留了在對談中建立退路的堡壘；而

即便會願意與台灣人無所不談，但面對談話中的想法表達方式也會視情況而定，且這其中的想法改變又會再隨著一定的社會事件發生轉變。

陸生們會逐漸在社會交往中認識到自己身份的特殊性，並對此作出回應。透過以上討論可以看見，陸生在台灣生活中對自我空間的受限，或許部分是因為處於保護自己、防止受侵害的需要，於是會有一些僵硬的繞行、猶疑的迂迴。而對於特殊身份的回應並非每位陸生都是希望隱藏，更有一部分的受訪者表示能夠適當利用、享受這份特殊性，或表達不同維度上的認同，或坦然接納並以之為生活擇友的準則；而受污名者同時也有可能「得益於」自己的偏差性質與偏差地位，成為社會場景的批評者以及人際關係的觀察者，可能會在其他在場正常人都不由自主的捲入情境中時反而變得具有「情境意識」——情境本身對正常人而言是「無需注意的背景」(Goffman, 2017c, p. 132)，但如果殘障者能組成家庭則會成為一件「成就」，正如陸生若一樣參與社會(民主)運動、加入對於各方面權力的反抗，就有可能被認為是「沒有被洗腦」、「孺子可教」的。但卻也是這種具有某種「特殊成就」的陸生，能夠對台灣社會運動於民主發展提出想法：

我之前來台灣就是加入異議性社團嘛……(Q: 為什麼?) 很感興趣啊，覺得很有趣，黑水溝社這些都加，但是之後他們就從小眾變得更小眾了(笑)……我覺得反送中這件事最危險的是，這個運動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被討論，完全不是只有一個「反中」的旋律而已，但也因為這個旋律最簡單、最好傳播，所以依賴於媒體傳播的運動就有這種缺陷，沒辦法給民眾帶來更深的思考，這樣下去產生的那種民族主義其實是很危險的……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同時進行社區培力，但這個確實很花時間很花力氣。(PY-7)

這位受訪者提到的對於台灣社運的看法，其實就是一種非常清晰的社會觀察。在媒體搭載訊息、網絡碎片化、知識碎裂化的時代，人們對於信息的汲取能力變得更加缺乏耐心也愈發需要簡潔，沒有核心、沒有立場的文字傳播幾乎會成為斷播，但真正的多元社會或市民社會，卻恰恰需要非常複雜的、多層次的豐富思考才有可能達成。

在文獻回顧中筆者曾根據 Young 對於 Moi 與 Merleau-Ponty 的結合思考中寫到，想要將探求方向拉回到一個主體最根本的感知、慾望與認同，則必須要關注到他的血肉之軀是如何在人際關係中展現與行動。我們都可假設、也希望並認為人必然具有超越性與能動性，但是正如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因為被單純看做為一

具軀體甚至是物體而導致女人在一面具有超越性的同時，又要負載著某種桎梏；在成為主體的路上又在無數次回身中成為客體，並面臨「模稜兩可的超越性」、「遭貶義的意向性」與「不連續的統一性」(Young, 2007, pp. 56-62) 那樣，陸生在一個政治環境貶義、身份標籤被污名為一種明確具體卻不容置疑的、脫離真實情景的想象中的客體時，就會在文化與社會上都被否認其具有自主權與主體性。緘默不語的原鄉力量孜孜說教著緘默不語，謹慎限制的異鄉環境不倦勸告著謹慎限制。於是，在政治困局中生活的陸生註定要過著矛盾的生活——本應該透過跨越海洋來求學的這條法律政治所賦予的路徑而「天生」成為「陸生」的陸生，發現自己的身份事實上是在某些處境下被決定的——是一種在他人眼中存在的符號與種類，是一種被凝視與決定好的體驗；他們在經驗自己為人/學生/陸生的同時，又同時經驗到自己是一種物/假想敵/政治標靶。於是陸生正如那女人、有色人種、有身心障礙的人一樣，也開始凝視自己，開始煩惱自己於他人眼中是什麼樣的存在，準備打造、形塑、裝點自我；或者，打破凝視。

(二) 「體現」的口音：作為行動者的陸生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還注意到，對於一些能夠有意識且有能力改變口音的陸生來說，會出現一種「談吐的鏡像」(Speech in Mirror Image) 的情境：在言行舉止之間仿佛有人凝視著自己，當他們將語音、語調、手勢與表情控制出不同的狀態時，都能夠清晰的觀察到其間的差異與被凝視的目光溫度——但卻找不到凝視的客體來自何方——行動者移動時凝視的來源也在移動，舉手時凝視的焦點也隨之流轉；當他們背過身去、拒絕被凝視的空間吞噬時，卻能清晰的意識到他們是無處可遁。「我」為何如此清晰的看見「自己」？在「我」與「自己」的互看、互動、互斥中，那個分裂之外真正的主體在哪裡？亦或是已不復存在？

其實我有時候模仿口音的時候，都會好像先在腦海裡過一遍那個聲音，當我講出來的時候這個聲音也好像會……我可以再同時聽到這樣的聲音。

(HU-5)

這種在說話的過程中出現的「另一種聲音」，恰恰是「談吐的鏡像」所指稱的凝視現象。在行動者張開嘴巴的那一刻，「我」便看到了鏡中的「自己」將嘴巴這個五官運動了起來；在唇斂閉合的瞬間「我」又想象到了如何使用口腔的開合大小、舌頭放置的位置以讓它發出的聲音更接近另一個社會的習慣。這種「談吐的鏡像」同時也是幾近與 Schutz 在現象學中討論的一些概念的。Schutz 認為人

類的經驗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動的經歷與承受 (undertake)，而另一種則是主動的、對前一種經驗所抱持的態度，是「意識之賦予意義的經驗」(Schutz, 1991, p. 62)，即人們透過自發的主動性對外界所發生的事情做出回應，並透過反省使之產生意義：故主體經歷過的一切事情並不是過後就掉入深淵，而是會被儲存、透過反思等步驟與其他事物或其他感覺聯結在一起，繼而在未來的某一刻再度被喚起。主動的意義經驗同時也是 Schutz 現象學概念中「行為」的定義，是「行動」的目標。兩者最大的差別即「行為」是自己主動造就出了感覺與回應，而這種反應乃是在過去即已經決定好的影響²²，故行為是被完成的體驗、是過去完成時；「行動」則是空洞的、對未來的預期，帶有計劃性質的方向，存在在我們腦中思考的行動本身就是已完成的完整構成²³。於是，我們可以透過過去行為中所儲存的經驗召喚、無限多次的越想越細之後生產出許多的細節，並拿這些細節將未來的行動「填滿」，故行動便必然是未來完成時。

在這些由行動與行為交錯填充的生命裡，「時間」變得無比重要——人的生命不再是軸線型的，人會在想到過去與未來的每一剎那，再重新定義過去與未來。而當陸生在陷入一種「談吐的鏡像」中時，在鏡像中「我」的談吐便也再現了這個特質：在過去歷史中陸生所看見、聽見與透過共同體想象到的、真實的受污名經驗都被貯存起來，並在張開嘴巴的那一刻被喚起——如果「我」用鄉音說話、暴露自己的身份，會被當做間諜還是立場相反的敵對想象？從這一次以後，嘗試有意識的、控制如何抿斂開合嘴巴的次數越多，那種儲存起來的經驗便無限多次的被召喚、銜接、組合，陸生本應當空洞的談吐行為逐漸變得豐富起來。本應當空洞是指向「如何使用口音」這一點的，因為一般人會考慮如何措辭、如何行動，但鮮少會考慮用什麼樣的語音語調送出聲波。這也像是 Schutz 所說的，人的每一種行動都可以被整合到一種「意義脈絡」中去，而每一種「意義脈絡」又可以再被容納到更高階的新的意義脈絡內，至於最高的那種，就會被稱為「經驗脈絡」——人類的每一種經驗、每一項體驗都是有背景、而非獨立的存在。

除了這種透過現象學的意義、依靠鏡像體「現」的陸生經驗，另一個可觀測的面向就是身體社會學意義上的「體」現。各種權力關係的作用點最終都會落腳在人活生生的身體經驗上，身份概念本是與差異共存 (lived with)、並經由之而產生的(Hall, 1990)，顯然口音勢必會帶來身份認同上的影響，但值得探究的是這

²² 「我考滿分很高興」乃是因為我認知到滿分的意義之後、對此做出了高興的回應

²³ 例如當想到「要走到窗前」時，並不會按照時間的步驟先想如何抬腳、再想要如何向前邁步，而是想的時候這個計劃就已然完整了(Schutz, 1991, p. 69)

種微小的身體展演又如何與更具有爆發力與行動力的肉身相展望？陸生的身份又會令作為行動者的主體有怎樣的行為展現與認同選擇——如何「做」陸生？

於是筆者根據口音的問題進一步詢問幾位常在運動場合中的陸生，要如何應對、又何時會在意自己的「陸生」身份，有幾位受訪者都在被問到問題的當下有些錯愕與失語；其中受訪者 YP-7 與 PH-2 在重新補足的訪談梳理便十分適合放在這節的開頭：

筆者 訪談的時候問我一些問題，我其實沒有回答很清楚。運動現場，我到底在不在意身分，什麼時候在意身分。

我後來想想這個問題很簡單：當身分成為問題的時候就在意，當身分不是問題，本來就沒有身分需要在意。2014年到現在，我從當初幾乎沒有身分需要在意，到現在越來越頻繁地需要去處理身分問題。整個變化的過程讓我疑惑到底發生了什麼。

圖 2：受訪者 PY-7 在受訪後再寫在社交網絡上的感受

受訪者 PY-7 因為受太陽花學運的吸引好奇來到台灣讀書，並從一開始就直奔了延續的運動現場（太陽花學運之後有許多學生回到校園做公共政治的宣導）、參加異議性社團，以求看見公民社會的運作與可行的可能。在文獻回顧中筆者梳理到，在公共領域中每一位行動者都應互相承認彼此的公民身份、透過彰顯以表達「我是誰」的問題，再經由對話、談論甚至是辯說與爭執，主力於公眾事務並共同想象、開創新的政治局面，而這整個過程按照 Arendt 的講法，便是一種「什麼是政治的」的回答(蔡英文, 2002)。但如果在運動現場中只能先看見身份、並由此便有一些情緒、焦點的轉移而令「身份為中介」轉變成了「身份為終點」的處境，那麼討論、乃至未來的交互都將戛然而止，公共行動也會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終結——或者說進一步在現實層面上實現了網絡公共領域的碎片化、複數化特點，但卻沒有達到足夠可見的多元。在存在現象學中，常常會認為人們對身體的存在認識是一種「透明的媒介」，只有在主體與世界的「工具性關係」崩塌瓦解時，這種輕盈的媒介才會轉化為一種笨拙的物質存在，並同時帶來抑鬱與不適(Young, 2007, p. 84)。在那種疏離的、客體化的過程中，陸生可能會覺得他被自己的口音囚禁，於是也出現了分裂的主體性：當我們注意在自己的事情時，我們並不會感知到自己的身份、口音、身體乃至任何一種可以被觀看到的「東西」，但一旦當我們察覺到他人的注視、更甚者被視為麻煩時，我們就會回憶起自己的身份、口

音與身體的厚重——仿佛受污名者有著雙重意向性，在知覺自己作為主體與作為他人眼中的客體時，我們的主體分裂成了兩種身份、兩種關注、兩種投射，常常不小心就會從輕盈的「這裡」滑越到纍重的「那裡」。

在有一種情況下，被凝視的陸生會得到解脫——或者是進入一種更被期待與欣賞的注視裡：

我身邊（台灣）朋友其實都知道我的立場跟他們很接近的……所以對我都
很友好，也把我當台灣人。但是有時候討論問題時候他們會說「好想把韓
粉都塞到中國」之類的話（笑）。他們是真的很……我覺得很奇怪，但又
不好說什麼。畢竟也沒有惡意，但就真的……嗯。（HU-5）

當一位陸生符合或利於台灣現代化框架與民主議事規則的情況下，他/她便獲得了台灣社會的肯認。前文已談到，陸生在大多數的語境中常常會被迫與其國族身份綁定，而中國/大陸的國族標籤在台灣已然成為一塊可怕的、密不透風的鐵板，因為現實逼迫隨處可見的「反中」論述成為台灣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一環——儘管並未有多少人真實的接觸過想象中的中國，故而這又是一種「熟悉的陌生」的存在——但若其中有人能夠「不被洗腦」、「孺子可教」的堅定的站在民主自由的這一邊，那麼緊緊追蹤他/她的目光便不再是出於一種對「熟悉的陌生」的好奇心滿足，而是投出嘉許式的注視，是驚訝而欣慰的。

除了被污名的身份，在行動中的陸生還會意識到光是如何表述「我是誰」都是困難的。在表述時會衡量空間時態、並傾向選擇用一個不那麼敏感的詞彙呈現原樣的事實，這種「自我隱藏型」的身份表達誠然為一種異鄉社會中的生存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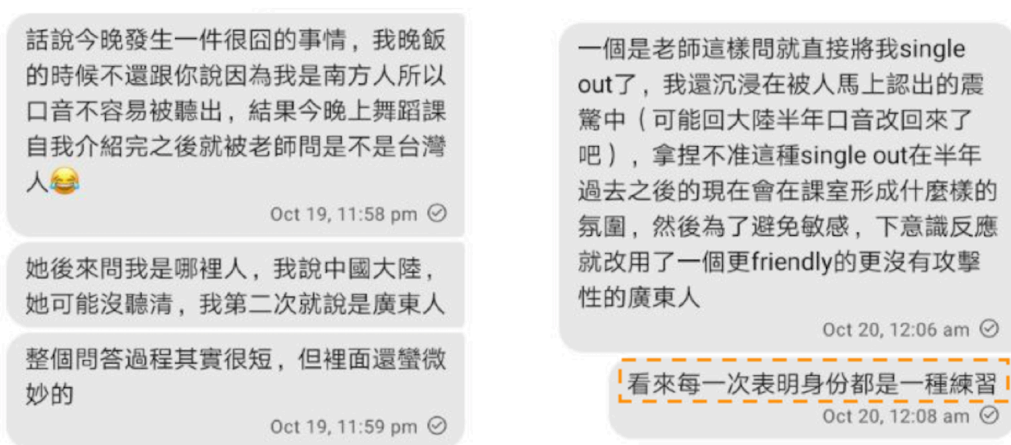


圖 3：受訪者 PH-2 在受訪後再給筆者的回饋

「表達身份」是一種練習的過程，陸生需要日復一日、在每一個被關心盤問的節口做身份的回想、找尋與打造，在用切實的身體置身各式無法提前預判的情境中做自我的摸索、試探、跌撞乃至衝撞；而這種需要不斷思索與的「打造」本身正也折射了「身份認同」是一種需要接觸「他者」時才會反彈形成對自我的審視，這是一個有多重場域、可以讓自身不斷進行轉變而存在的過程；強調身體現象學經驗的梅洛龐帝認為，人的身體在面對周遭環境的自我定向以及面向環境而行動之行為，便是一種「身體作為對世界的純粹的在場」的證明，故而只有當身體能夠在周遭中定向、移動、並藉著意向以趨近掌握其所在環境時，「主體的世界才會存在」(Young, 2007, p. 58)。顯然，陸生在台灣生活中會遭遇有抑制的意向性，在軀殼/肉身孑然跨越疆界時，其身體也因為歷史遺留問題與現代化的國族性污名標籤而無所憑賴。這種遭抑制的狀況不僅存在於一般的交流中令陸生的言行緊張與僵硬，更是制度上的問題使與一般常人無異的實踐也變得迂迴：

我每次去看醫生，都要第一句先說「我沒有健保卡」，然後看醫生們錯愕可能還有面露難色去問這個情況要怎麼處理的時候，我都覺得，這些時刻就是在一直提醒我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這樣我也不希望，或者不會想起我是陸生啊。(SP-5)

在文獻回顧中曾提到，有學者在做陸生赴台的研究中運用了「矛盾的再疆域化」(Contradictory Reterritorialization)來說明陸生在臺生活中會面對到因制度產生的種種劃界：在 2008 年時，兩岸關係逐漸和好並開始了直接的通郵、通商與通航(小三通)，在兩年後，兩岸更進一步決定要讓學生「交流」，但礙於各方立場大相逕庭(前後總共經歷了 15 年討論，在立法院中的各黨派立委也多次為爭論此議題爆發衝突)，故臺灣政府在規劃「陸生赴台就學」時用一系列政策(例如「三限六不」²⁴與「一限二不」²⁵)，希望在名義與實際操作上同時兼顧到各方立場，但造成的結果就是使「陸生」角色在誕生之初其所有可能出現的棱角就已經被打磨拋光；在台灣憲法中以「大陸地區學生」身份存在的陸生，輻射到司法、教育、醫療等各資源分配體系中卻遇到了待遇既不如台灣人、又不及外國人的矛盾(張育嘉, 2015)。而受訪者 SP-5 以肉身在社會中生活時會遇到的最實在的猶疑與卡頓，便是這種矛盾的最直接的、活生生的「體」現。

²⁴ 即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學歷、限制來臺中國大陸學生總量、限制學歷採認領域與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臺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

²⁵ 限制醫事學歷採認與不允許打工、不能參加國家考試。

這些因為不可選擇的身份而成為問題的時刻並不是陸生生活的全部，更有一部分會因為污名的社會狀況而連「問題」都算不上：

我其實都會去反送中遊行現場（因為支持，有時候是去一起發傳單啊攝影啊之類的），現場就會有主持人說「謝謝到場的香港人、台灣人、澳門人、馬來西亞人」，甚至有時候也會有「新加坡人」，但唯獨沒有陸生。我站在那裡，就會覺得……（ZP-3）

受訪者 ZP-3 常常參與社運等公民活動，有時還會在現場當志願者，但是在她身上卻看到了一種並不存在於社會空間的「不在場證明」：你的身體在這個社會/空間裡，但社會/空間並不承認你。這又恰恰再印證了受污名者之身體在空間中的貶抑與阻隔：有人在「那裡」行動，但卻不是「我」；每種舉手投足的動作的意向性都無法觸及到更遠的地方——就像「這裡」與「那裡」的空間被切斷了（Young, 2007），流暢的言行成為迂迴的負荷、無奈的繞行，於是實踐過程中的僵硬與猶疑成為了下一次行動之前的嘈雜背景：「我」是否還要再行動？

在研究身份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領域中，常會提到各式各樣的身份選擇，例如能夠在被一些界限（諸如國族、種族等）綁定的身份中選擇成為另一種身份。但事實上行動中的陸生在面對自己的身份阻礙時，又有各式的類型。其中在訪談第一屆赴台至今、為陸生爭取健保等各校各項權益的陸生余澤霖時，他的回答則更像是一種積壓已久的噴發與釋放，並將自己與另一位「明星陸生」蔡博藝做比較，同時帶出了兩種作為行動者的陸生的身份認同類型：

我就跟蔡博藝不一樣，她是完全不把自己當陸生的……但我當時在太陽花立法院裡，我聽到那些「支那」的言論沒辦法不難受，對，我就沒辦法不意識到自己是個陸生，這個身份沒有辦法脫離。（LP-9）

他認為蔡博藝²⁶這種類型是完全拋卻了原鄉身份，但是自己仍無法擺脫「陸生」身份、無法逃脫。而他對於自己原籍地所自然攜帶乃至捆綁的情感困惑，也有許多非常駐社運場合但默默支持台灣民主社運或聲援香港運動的陸生有同樣的感受，他們一樣對於原生身份有一種無法擺脫的負擔，因為自認或迫認而背負著對於原鄉的責任及歸屬感：

我是支持連儂牆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啊，但是後來交換生撕毀連儂牆以後，大家都在清一色罵我們陸生，明明那些都是交換生做的，但我們就要背鍋，

²⁶ 深入台灣公民運動的陸生之一，是《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女主。

就很難過……我有時候就對他們說的話很生氣，我覺得我明明很 nice 啊。

(XU-3)

我一方面很希望跟台灣人討論，但另一方面又沒辦法像他們那麼輕鬆。我們當然可以嘴上罵罵中共怎麼會這麼威權、這個國家怎麼這麼多限制，但是他們罵完就好了，我不行……我生在那裡，長在那裡，有更多的責任或者說義務，還有很多複雜的情感不是說罵一下就可以結束的。我的父母也是他們口中的「小粉紅」跟「戰狼」，但我不能就簡單的說「小粉紅都是白癡」，我不可能這麼說……你知道當我在跟你（筆者）講中國又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只需要講發生什麼事情，不需要說很多的脈絡去解釋啊。其實中國很大所以一般的管理制度很難運行、整個國家人數太多所以會有光怪陸離的事情很正常啦、有很多環境教育原因並不是這些人天生就如何的……但是跟台灣人聊天就要……最氣的是這些事情就是不可否認、切實發生的，而我作再多的說明也顯得很難讓對方理解為什麼要說明…… (SP-5)

我其實很喜歡看綠色粉專。(Q: 為什麼?) 想要了解這個社會啊。而且沒有什麼的……但最近不太看了，因為疫情被政策隔應，那些越刷越心煩。

(RP-2)

當一個人在一個由社會文化等充滿權力關係網的「場所」(place) 中能夠有自然的感受時，便會產生較高的認同感；而移入者常常因突然進入、打破、衝擊了原居者對於原生環境默認的一套規則與道德想象，常難以釋出善意，反過來則易使移入者在場所認同的聯結上產生了斷裂而難以獲得認同感。無論是想要與那些不尊重其他社會文化與制度模式的陸生（交換生）「割席」，還是在積極參與台灣公民社會運動時對自己被一些既定意識與氛圍「視而不見」的困惑，亦或是在普通交往過程中面向即使是好心的詢問也難以開口、難以名狀的對話，這些無不表現著陸生在台灣社會中被迫遁匿的主體性；如受訪者 YP-7 所說，陸生仿佛像是「一團不可名狀的、從中國那個邪惡國家裡飄散出來的黑霧」，無論是否願意成為「特殊」的境外生，事實上大家都希望能夠被正常的「看見」。在文獻回顧中提到有學者對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提出了身份認同上的批評，除此以外，忽略情感層面也是常見的另一種批評。過往的公共領域常會為了強調某種「理性溝通」與「批判性思考」而將文本、知識作為中介，但在「文化公共領域」中卻可以有以情感作為中介的藝術作品——「情感」與「認同」，事實上在公共領域

中一樣佔有特殊意義(Gripsrud, 2007)。McGuigan(2005)便認為並不存在一個所有人都可以進入、並擁有平等參與權的公共領域，即這種理想型本身就是充滿脆弱性的、含混未明的、不可預料的動態空間，但昏昏迷離的場域卻可透過大眾傳媒（一種超越過去傳統文學公共領域的介質）使異議昭昭。台灣當代學者在論述公共領域的困境與轉機時，也認為人際之間的共通感受與「常識概念」（*sensus communis*）是最基本得以對話的基礎(吳介民, 2004; 李丁讚, 2004)。顯然在社會污名與制度框架的雙重擠壓下，所謂「公共行動」的可能已微乎其微。「陸生」的誕生土壤，本身是來自於希望撫平過往傷痕、鬆動僵硬石土的期待，但東海岸的島嶼將「生產」陸生的空間置於各處受限的體制框架，西邊的大陸又將本應給予陸生潤滑支持的行前通知變成政治動員大會，面對非我群的他者，好奇、畫圈在所難免，然日常行為上少了尊重的好奇會演化成獵奇或談資，社會制度上缺乏考量的畫圈會演化成歧視，原鄉的緘默與迫近的政治高壓又懸於每個陸生的心中——「陸生」正是在這種擠壓、再擠壓的過程中，以「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gress*）的狀態真正誕生了。正如在女性主義中所討論的「無人天生是母親」的概念一般，並不是經歷過生育過程後女人就突然身份轉換稱母親，而是要在一次次經驗中學習成為一個母親的；「陸生」也並不是在跨越疆界的瞬間就多了這樣一種身份，而是要在一次次練習、跌撞、摸索中透過認知與回應以成為一種在社會中「想象的陸生」、法律裡「中國大陸地區學生」之外的陸生，是需要靠活生生的身體在社會中活動、展演、從細微的口音到龐大的行動能力之間找到獨屬於他的與世界的聯結，「做」成陸生的。

第四章 疫情下的滯留與轉變

2019年12月30日的下午與晚上，「武汉大学林场04级(146)」、「協和紅會神內(25)」與「腫瘤中心(381)」三個微信群內先後爆出相關文件與證明，指武漢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即之後的COVID-19），在協和二醫院確診一例冠狀感染性病毒肺炎，提醒親友勿隨意走動；2020年1月11日，在新華網刊載《專家稱武漢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市政府未及時反映、社區基層無接達該病毒嚴重性之信息的背景下，COVID-19搭載著寒假伊始、春節前夕的大型流動人潮流竄於所有空間。1月23日，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宣布將於隔日起暫停出口醫療外科口罩與N95一個月，以確保本地貨源供應無虞；1月26日，教育部出台了一份充滿爭議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後文將簡稱為《指引》），正式引爆了陸生群體與台灣官方之間的「攻防戰」²⁷。筆者將按照時段分類，整理整場「戰疫」過程中陸生的社會污名、公共行動力是如何步步建立、遇到什麼樣的阻難的。

（一）猝不及防的指引與兵荒馬亂的自救

第一個時間段是自《指引》發佈起的1月26日，至後續疫情從武漢蔓延到全國、台灣外交部公告「曾經入境或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一般外籍人士」禁止入境之2月7日止。在這段時間內，對於陸生來說尚有回台的希望，但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回台」。據筆者在微信朋友圈、受訪者訪談、Matters 與端傳媒等媒體投書等處瞭解，絕大部分陸生認為該指引的爭議點在於其「第三類」中的管理、設備及行政措施，梳理如下：

一、管理方面

- 1、管理人員的身份並未指明是專業醫療人員還是學校管理人員
- 2、若管理不當、病毒擴散之後果由何人負責並無說明

二、設備方面

- 1、對集中場所的設施要求中提到，若「無法單獨一間，同房之床距至少1公尺或設置屏風」，根據（當時）已知的傳播途徑來看，存在人傳人、

²⁷ 事實上之後中國/大陸官方亦有透過「對等打壓」的方式「參戰」，但一開始在面對需要再商討的《工作指引》確實只有陸生在其中聯署、斡旋。

醫務人員感染、一定範圍社區傳播的可能，那麼「設置屏風」是否容易增加交叉感染的可能？

2、按照文件旨意，隔離地點的設置需由各高校自行決定。而根據蘋果日報當日（1月27日）發佈的新聞²⁸，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司長黃雯玲指出「各大學得先找到足夠管理陸生的床位，通報中央確認後，才會開放陸生來台……例如，某大學陸生人數有500人，但提供床位只有300床，開放後能來台就讀的陸生就只有300個名額，要等到學校找到500個床位，才會開放500個陸生都來台。」，由這項聲明可延伸兩點疑問：首先這個「開放」要如何落實？按照司長的句意應該是由各校方決定，但根據陸委會最新（107年）統計數據，目前在學陸生有近3萬人，其中各大私校陸生佔比人數眾多（如輔仁、逢甲、文化等），這些私校要如何在「供小於求」的情況下妥善安排？教育部是否可以進行更多的協商、補貼等措施協助？其次，文件緊急、事態緊急，但校方的行政部門仍在春節假期，或無法快速運作應對此事。且當時（一月底）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學的部分學生宿舍被征用為「政府隔離設施」，被征用之宿舍可給任何接獲居家隔離令的國際學生使用，台灣教育部之《工作指引》很難被認為是經過思考後發佈的。

三、採行措施方面

1、在落實的過程中，勢必會影響到部分陸生的學業狀況，這份影響又當如何平衡、補足？（例如上課安排、考試安排等等）

2、教育部發放之措施引導，終將交由各校方落實，那是否能有關組織或平台督促這份落實，監督雙方一起為防治疫情、保護所有群體而努力？陸生若在整體過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否有公開權威的可保護自身利益之途徑供參考？

3、陸生並未享受相關醫療保障制度，目前只有各校陸聯會督促自費之陸生保險，若需要就醫，則該方面之醫療費用又當如何結算？以及相關水電、飲食之費用又要如何結算？

由上可見所謂《工作指引》內部漏洞顯然，或因其是「指引」文件而未能一一詳待，但在當時確實引發了整個陸生圈的不適應與抗議。台灣作為一個熱帶島

²⁸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00128/23FCRVWVWEXLBKE3Q7LUUZXRHQ/>（發表於2020年1月28日）

嶼、經歷過慘痛 SARS 經歷的它極度需要嚴防嚴控，事實上也有受訪者再訪談過程中表示非常支持適當的隔離政策，「不然就是一個超級細菌培養皿」(ZP-5)。但大家不滿的最主要原因集中在粗糙、且無防疫效果之「屏風隔離」措施及針對陸生而不針對病毒防疫的歧視性指向。人類作為傳染性病毒的寄宿者，並無性別、種族的區別，經過科學探討得出防疫重點在生活史與行動足跡上的結論時，何以經過大陸的台商、陸配與旅中台生能夠自主隔離，而陸生卻是集中監測？當時的陸生圈甚至一度有人傳出「集中營」的形容，大家的不信任與無措，或可從該詞的誇飾形容可見一斑，「『心理支持』是『隔離』與『監禁』兩者最大的分野。事實上，即便是監禁，也有提供心理支持的照護。」(許崇銘, 2020)

於是抗議此不合理指引的第一份「陸生聯署」自然而然的開始大規模傳播，至其截止時聯署人數多達數千人——在向來沒有什麼凝聚力可言的陸生圈子裡已是超前團結的表現。但同時這份聯署亦有非常多的空間待商榷：例如不慎使用的情緒性字眼，導致眾多具有發洩性的情緒在傳染，但據筆者觀察並無多少陸生有從頭到尾詳閱過《工作指引》，「要先轉起來給台灣壓力！」(FU-3)；例如沒有完備透明的計劃作為與當局協商的基礎、亦無在聯署之後向群體告知進度（事實上有一個相應的關注疫情陸生大群，但群內消息並未有效傳播給其他各學的陸生）等。且以結果來看，當時這種以「聯合」的名義提出質疑/要求/建議、在焦慮與憤懣的心情下無暇考量措辭之聯署，並未建立真正有效的與台灣官方溝通的機制；陸生 Sally 曾以個人名義在 Facebook 上發佈陸生回台需求的懶人包，但在數日內引來千人評論，大多數評論都以「不爽就不要來讀啊」「滾回中國」等在三一八學運時便出現過的言論「回擊」，最終以 Sally 本人註銷 Facebook 為暫時收場；而身為台灣人、專門研究醫療人類學的許崇銘學者，亦因在個人臉書與端傳媒投稿等處聲援陸生獲取公正待遇而接連受到炮轟與謾罵。雙向的群體對立、社會污名加固，在疫情席捲而致社會不穩定時，兩難的境地則將陸生推向更深、更不可逆的不利情境中。

之後，陸生真正的「自救」開始展開：聯署活動的繼續進行、「新冠肺炎-在臺陸生關注組」的粉專開設²⁹、各校方回應統計群的持續整理都是一些在前線默默爭取利益之陸生的每日日程；還有一小部分陸生與台灣學生聯合會共同合作發表聲明(台灣學生聯合會, 2020)並成立溝通平台，境外生權益小組、TIWA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發表聯署聲明(台灣人權促進會, 2020)，許崇銘學

29 [facebook.com/NCoV.lsgz/](https://www.facebook.com/NCoV.lsgz/) (最後瀏覽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

長持續於媒體發聲(許崇銘, 2020), 魏玟、郭力昕、王維菁(魏玟、郭力昕、王維菁, 2020)等教授公開支持, 都成為當時救援陸生行動中的濃厚一筆。

儘管各種「救」都在如火如荼進行, 但多人的「落」卻無法因此抵消: 據受訪者表示, 陸生內部有數個小團體意見又各自分歧; 資訊圈仍不夠(實際上也不可能)完整, 故消息散落卻不能鋪滿所有角落; 當時周圍有幾位幫助陸生爭取權益的主力也紛紛因為體力不支或抑鬱症在即而默然退出, 一位在其中前線負責搭橋聯絡的陸生表示:

我就好像游離在邊緣, 不知進退: 退後會有那種公民責任與群體道德感促使我做更多的工作, 但往前走的時候又有無數種同時來自陸生、台灣人與其他大陸人的歧視真的是砸下來的你知道嗎……好像沒有一個劃定的邊界屬於我們的, 那種「幹嘛要跟台灣人合作?」、「這年代了還有人去傻島讀書?」、「最好都滾回去以後別來台灣」也讓我失眠很久。(HU-5)

事實上這些極端觀點並不佔群體的多數, 但它們以及它們的衍生言論都是由政治博弈、全球化倒退、民族主義興起等語境打造出的堅甲利炮, 都足以碾碎每一個身份認同模糊、擁抱多元存在的這群陸生——更鮮少有人給予關注與理解——恐是真正的「化作春泥更護花」, 護民族主義之花。但同時也有幾位陸生表示, 在行動中能夠擁抱傷痛、帶來力量與自我和解的可能:

疫情的時候我拜託朋友幫我整理房間, 那個時候我朋友也被嚇到了……因為我每次看完醫生都會留著藥單, 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 2019 年下半年吃了那麼多的安眠藥跟抗抑鬱症的藥。整理出來有一大把……現在好很多了, 在小組裡工作有讓我覺得有力氣一些。(HP-5)

就有溫和的推動一些事情吧, 雖然真的溫和的像舔狗(笑)……會小組裡的人一起崩潰, 也比較好。(RP-2)

傳播學者 Ma(2000)定義網絡公共領域有三種功能: 一、聚集不同族群提交意見的管道, 進而能夠消弭文化差異; 二、令遭到打壓的弱勢群體透過網絡發聲、被賦權 (empowerment); 三、打破以人際為基礎的社會秩序, 創造出超真實 (hyperreality) 的世界。而在這些受訪者身上所看到的, 正是那種透過在網絡公共領域中行動所帶來的賦權力量, 這樣的力量也能將身體體驗中的無力、羸弱感縫合, 即便不需要透過十分直接的走、跑、衝、喊等有爆發性的可觀性非常強烈的動作來體現「行動」, 但網絡公共領域顯然也給了新世代行動者們一個可行的

方向，尤其在疫情肆虐、保持社交距離將成為常態的世界裡，陸生的「自救」計劃能夠將打破污名的行動搬到另一個場域中，也隱隱約約地為未來公民運動提供一種可實踐的方向。

（二）被「獵巫」的恐懼

第二階段是從 2 月 7 日至大部分陸生返台成功的 10 月為止。隨著疫情的擴大，台灣開始逐步禁飛：從湖北、廣東省，到頻頻出現在各大台新聞裡的浙江省溫州市，以及到後來整個浙江省、乃至整個大陸範圍皆暫緩入境。再然後是將「暫緩」二字替換成了「無限期」停止入境，自 2 月 7 日至論文寫稿之日，兩岸往返入境的途徑上僅保留北京、上海浦東、上海虹橋、廈門與成都五座機場的航線，同時，兩岸小三通業務暫停——加上之前自由行的停辦，如今陸生赴台的暫停，可以粗淺的說，「有生之年竟然見證了兩岸斷航」；而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官方亦不遑多讓，4 月 9 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單方面公告「暫停 2020 年陸生赴台就讀試點工作」的文章，並在短時間內登上了微博熱搜第四名。至此，「陸生」這個名詞、標籤、符號、代表、種類、一種從未被當做由「人」組成的群體來看待的不可名狀的生物，將正式進入歷史。

在公告發佈後，陸生內部一片嘩然，這項「對等制裁」³⁰在一定程度上宣告著祖國「勿謂言之不預」³¹的嚴重提醒，也令絕大多數民族主義者為之鼓舞，如此的社會局勢便反過來令更多在「亟待收復之領土」上唸書的陸生喪失回台的信心，也因此背負著更多的不解與罵名。

作為學生，「榮幸」成為國家的政治犧牲品，被犧牲的時刻都不給人任何的準備，我們這群人就這樣默默像煙一樣消失在原本順流行走的生活裡，衣櫃裡的衣服都快腐爛了，人生計劃也腐爛了。

這是筆者在四月中旬時看到的一段陸生感慨。宿舍裡的化妝品、貴重用品、易受潮物品在小島濕熱的天氣裡要閒置到何時，無人可知。台當局無暇顧量、陸生自己無暇顧量、剛從疫情的水深火熱中緩解過來的中國/大陸人更無暇顧量。在這裡，這位在之前從未討論過政治的陸生，卻明確於社交網站中公開發出自己屬於「國家的政治犧牲品」，之後亦多透過在臺結交的友人來幫忙收拾房間以防

³⁰ 中國外交部常用政策及詞彙。

³¹ 因《人民日報》曾在 1962 年中印邊境與 1978 年中越邊境問題時用過此句，以示警告，故常被認為是嚴厲外交的象征。今年（2020）的四月與十月，《人民日報》亦針對台海問題使用過兩次。

止「腐爛」。於是發現，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政治日常上被排擠的群體越需要靠平日包容溝通情境下結交的同溫層師友一同協助渡過難關：有朋友的便拜託友人幫跑註冊、搬家、取快遞；平日師生關係不錯或老師有公民意識的，便能與老師溝通協調如何「彈性就學」以使個人就學權得到保障；再好一些的能擁有台灣在地 NGO 組織人脈者，就能深度關注事態發展與問題解決之道。但本就愈來愈逼仄的公共環境，導致這種能開出包容之花的種子愈來愈少。一邊崛起的是大國意識，一邊響亮的是本土認同，在民眾缺乏交流、政府亦拒絕對話的情況下，這兩種本就互不相容的意識形態便會成為一把火，燒斷過去的聯結、燒光未來的和好，更燒熔一批無辜學生的人生計劃，只留下散發著餘溫、觸之燙手的焦炭，烏煙不散、瘴氣繚繞。

除了擔憂人生腐爛，還有根據過去所有經驗、疫情初始網絡上的撻伐經歷，使陸生們對於被「獵巫」的恐懼與焦慮揮之不去。「獵巫」一詞最早出現於 15 世紀基督教世界，當時還有一本著作專門論證女巫存在且具有「邪惡本質」，並在其中教導應如何審判與處刑女巫(Kramer & Sprenger, 2007)。至 16-17 世紀，對於女巫的假想逐漸照進現實，人們開始因那令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的恐懼，而意圖尋找一種能夠代罪的群體，並最終將矛頭指向了女巫，由此造成了將近二十萬的女人被指認為巫、遭到凌訊而亡(Levack, 2015)。在集體恐懼的催化劑下，人們透過「儀式化的暴力」急於從外部尋找問題的源頭並孜孜不倦的消滅、慶祝、再消滅、再慶祝，直至發現現實並無改變時，指責與攻訐已擁有了可自生的土壤，「獵巫」成為一場不可控的集體狂歡。之前就有許多研究近代歐洲獵巫風潮的學者認為尋找替罪羊的獵巫行動或許從未、也不可能從人類社會中消失(王明珂, 2020)，因為從外界他者的指控中，可以更凝聚內部社群的溫暖，這種看似是十分原始的「社群自保」反應，是完全有可能發生於活在家庭、民族、國家等框架與共同體下的現代人身上的——而 2020 的新冠疫情或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最開始的《工作指引》便「指引」了這樣一個方向：一種席捲全球、史無前例的嚴重傳染型疾病是可以與特定身份綁定的。「多元共存」與「和平共生」只會被認為是「不識大體」的口號，「為什麼要開放給炮彈對著我們的國家入境？」進化成「為什麼要讓病毒進來？」，「陸生都是被中共洗腦了二十年來的啊」轉變為「平常都反台灣啊現在帶病毒了進台灣出問題誰負責？」。在想象的與實際的國族危機面前，來自「敵國」的陸生因為台灣政府的「指引」與兩岸官方看似

有來有往的政策博弈，成功地站在了新時代台灣的女巫獵台上；被迫承受這般捆綁的群體將會成為所有溝通討論、爭取應得權益的終點：

當時我本來要跟朋友們一起租屋的，後來房東知道到我是大陸來的立刻說不給我租，而且我朋友他們已經強調了我會先隔離 14 天的……根本沒用，可能我的身份有毒吧。（UL-5）

身份被惶恐的社會沾染上了「病毒」，並連帶著有機體本身成為談之色變的存在。然而這種帶有偏見的想象與恐懼並不是與病毒的爆發同步產生的，早在千禧年附近，東西方皆已頻繁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講法(李思嫻, 2015; 邵軒磊, 2012; 陳欣之, 1996)，而在國際舞台上一直被中方壓制的台灣，尤其在近幾年「武力統一」的話語不斷在兩岸官方與民間流傳時，這種涉及自身與土地的威脅已經無法不被重視，恐懼感令所有人的猜疑與仇恨轉接到最「適合」的「敵國異類」陸生身上。

台灣在最一開始以「中國/大陸訊息不透明」為由拒絕我們入境我覺得正常，我也覺得不透明，但是現在都八月了，你先開放疫情明顯更嚴重的歐洲國家，還有港澳，全部都入台，然後再搞一個「髮夾彎」，你說不失望是可能的嗎？（UH-5）

這位受訪者所提到的「髮夾彎」事件是 2020 年 8 月 5 日時，台灣教育部發佈公文明確指將開放不排除陸生的所有境外生回台；然至晚間記者會，卻突然「因為兩岸事務主管機關要求再審慎評估」而宣佈唯獨禁止陸生返台。連公文都能撤回，這件事驚訝的不只是陸生，還有眾多私校的老師、助教。據筆者所知有多個北部私校的陸生負責人也都因為期待許久，而在一接到公文時便通知所有學生抓緊買機票、轉身去搶定防疫旅館，導致臨近幾日的機票瞬間銷售完畢，結果髮夾彎一出，又在錯愕之餘緊急通知學生退票、與防疫旅館道歉及退訂。

台灣政府並未給陸生人數眾多的私校提供能夠協訂防疫旅館的選項，導致一個學校內部的陸生回台情況將由校方負責人自己承擔；但校方如何行動卻要聽命、甚至揣測判斷教育部與防疫部的口徑，在髮夾彎事件後更難以快速判斷；而無法快速「下好離手」的結果通常是搶不到防疫旅館，進入新一輪惡性循環。

美國傳播與教育學者 Neil Postman 曾對 1930 年代中期納粹德國的野蠻行徑作分析，透過電視媒體的娛樂化與膚淺化以說明人類賴以光榮的「理性」與「啟蒙」事實上是極度脆弱的(Postman, 2011)。而在 21 世紀的今天，網絡媒體代替了

報章雜誌，政論觸手嵌入電視節目，愈發捕風捉影、怪誕獵奇、簡短有「核心」的文字愈能成為爆點，嬉笑怒罵間便結束了碎片化的「知識」收取，談資流轉之後環境寸草不生。一方面，COVID-19 令所有全球性流動的事物都在表面上暫停：移工與移民的遷移、歐洲難民在各國邊境前的敲門問訊、中美貿易戰下企業與個體的生存等，似乎都被迫停下腳步，然權力的壓制與不平等卻不會因為這微米級別的病毒而陡然平衡，反而這種物理上的限制使本就弱勢的族群更加囹圄難行：家暴案件、種族歧視事件的激增便很好的說明了這點；另一方面，雖然各個國家在抗疫時大多捉襟見肘，但國家領袖卻幾乎得到了比疫情之前更高的聲望，透過傳媒控制、官方宣導、大力挽救、「安內攘外」等手段，配合上人們惶恐不安的心理，一齣齣精彩的自救大戲在全球各地都感動上映。輪到兩岸時，這般控制、宣導與挽救的目標便自然地使台海成為了擂台，或毋寧說是一種角斗場，政府官方坐在台後津津樂道著對方的洋相，你一言我一句的說「來啊！」「打得好啊！」，再將所有棋子往中間一撒，排排站開：陸生、陸配、小明、台商，這些全部都是上好的家國籌碼，在「勢必保護中國人的利益」與「尊重民主人權」之間前推後搯地打轉，不亦樂乎。

（三）返台之後捲土重來的身份練習

在第三章中筆者曾詳細討論了細微的口音身體展演與宏觀可見的活生生的身體之間的聯繫。在疫情之前的在台生活中，陸生要肉身面對的是與不夠現代化、具有軍事威脅之國族綁定的污名想象，在這種社會空間裡，主體的行動將會是遭貶義的、猶疑的，在透過口音被辨識出身份的剎那，空間被一種堅固的想象畫割出「這裡」與「那裡」，是迂迴的；而在疫情之後，這種污名將直接上升到更直接的空間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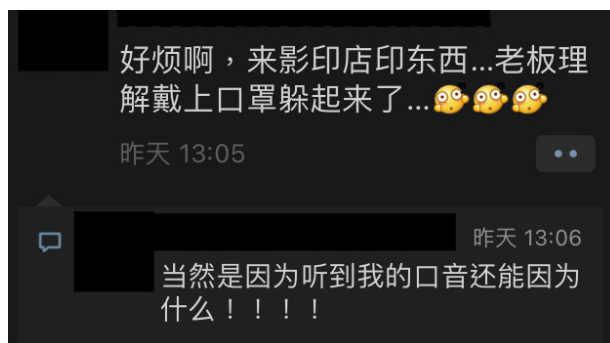


圖 4：2020 年 10 月，一位具有濃厚北京口音陸生的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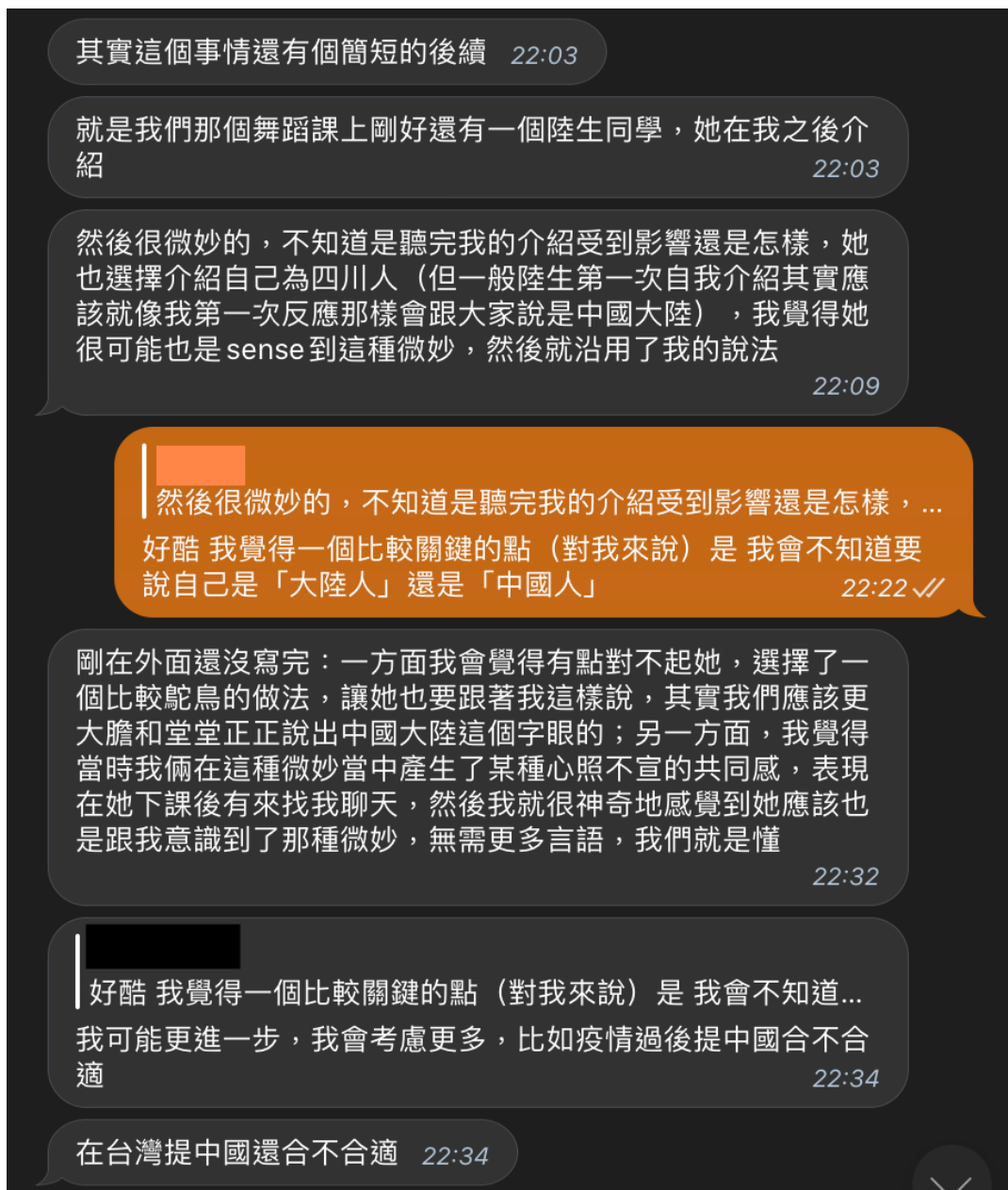


圖 5：受訪者 HP-5 在訪談之後於社媒上分享給筆者的更多補充

上圖的這種經驗事實上也是非常多受訪者在與筆者訪談時有提到過的，一種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是誰」的體驗。過去這種糾結與彷徨可能會發生於混類接觸的社運場合、課堂報告上，通常會出於對台灣現實狀況的猶疑（類似於在研究緣起中提到之「種族歧視」），或者出於保護自己、防止受侵害的需要。但在疫情之後，說出自己身份的考量將因為一種「害怕得新冠」與「害怕被誤認為傳染源」的雙重擔憂、因為在肉身上最直接的聯結經驗而變得更加難以開口。這也像社會心理學中會提到的「小眾壓力」(Minority Stress)，過去常用來研究 LGBTQ 族群在日常生活中因為身為小眾群體而做出比一般人更多的預判、擁有比常人更

多的擔憂與驚恐，導致生理上的壓力也多高於平均值。事實上疫情以來，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訪者都跟筆者提到過自己有憂鬱症傾向、有兩位受訪者提到了 PTSD 綜合征，認為這種無論是心理層面還是生理層面（最大可能的新冠攜帶者）的小眾身份，都為自己平白添出許多的煩惱。

端傳媒國際組主編甯卉曾比喻道：輿論就像一層土，風一吹便可以揚起沙塵、迷住人眼。故而浮土如何，定無法代表土壤之下的生態體系，亦無法定義土壤之上的生命美景，如若真心想要瞭解對方的園子里究竟長了什麼樣的果實、開出什麼樣的花，可以嘗試去對方的土地上走一走，親身去看見、去對話，或去閱覽多方的記錄報導，而非只拘泥於自家或他家的攝像頭，掉入過度美顏或偏居一隅的世界里。在這點上，陸生無疑是兩岸之間負責在學術領域、公民社會領域中摘果逛園的大使（不管其自身能不能意識到這一點，陸生這群人自帶的政治光環便是如此），如今這條路卻因無從對談的政府而關閉，本計劃為當上大使、或單純為摘果賞花而努力的平凡人亦突然被按下了人生暫停鍵，「准陸生」直接犧牲。而實際上，真正的陸生亦兩邊受罪：



圖 6：公眾號《不要讓陸生消失》因為投訴而消失了

兩岸關係日趨緊張，昨日是台灣教育部以防疫之名行歧視之事，今日是中國/大陸教育部以保護之名行無理之法。政府缺少同一頻道的溝通的同時，人民的輿論戰亦愈發欠缺同理，單疫情爆發以來，武漢台商如何包機返台的協調便出現了許多碰撞，在台陸生如何返台就學亦摩擦不斷。作為「兩岸夾心餅」（QP-3）的陸生無不生活在欠缺理解的泥淖中，身上的標籤一式兩份，赴台時不受歡迎，回鄉時更不受待見。

事實上，在論文發表期間筆者父親重病，急需回鄉陪伴。但在上網查閱如何自費核酸檢測（按規定必須有三日內核酸檢測結果才能上飛機）時巨大的焦慮籠罩著筆者：關鍵字若加上「陸生」，搜尋結果寥寥；關鍵字若去除「陸生」，可以看到大量官方、正式的公告與政策，卻總是無法在白紙黑字中看見自己是否歸屬在內：「陸生」本身就是兩岸的「意外」。所以當我們移動到任何一個地方、在任何一種條文中想要找尋自己的位置時，都會發現自己被歸類在代表一種額外情況的括弧裡——甚至連括弧也沒有的地方。而依據梅洛龐帝的說法，身體是「作為對世界的超越性的在場以及意向的立即落實而存在」，所以身體無法、也不能夠成為客體(Merleau-Ponty, 1996, p. 123)。但是在制度中難以找到身為主體應當存在著的陸生，在日常溝通中亦經驗著那分裂的空間意向，以及因此為活生生的身體所帶來的沉重枷鎖。所謂「陸生」的身份練習帶著更刺骨的冰寒捲土重來，所謂擠壓下而在過程中產生的主體，復重新在另一個過程中經歷。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局限

(一) 研究結論與結語

本研究從陸生的口音現象入手，挖掘這種最能代表身份的身體特征是如何與其身體其他的行動聯結、在社會中生活的。口音雖然是一種隱細入微的、間接難察的身體展演，但期間能夠「體」「現」出來的身體社會學的力量與深度卻足夠令人訝異：在行動者張開嘴巴的那一刻、在唇斂閉合的瞬間、在使用口腔的開合大小、考慮舌頭放置的位置以讓它發出的聲音更接近另一個社會的習慣時，身體的「我」成為了社會的「我」的掌舵者；至於同時作為行動者與受污名者的陸生，其在台灣社會中的公共行動力量則將會是一種更直接的身體能量的釋放。儘管陸生們在更廣闊的身體層次上，也與細微的口音一樣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分裂與貶義（如因為口音被視為間諜者或在社運現場「被不在場」者），但也因此萌生出了更多的復甦與創造。在這些斷裂的嘗試縫隙裡，或或多或少的緊張、滿足的時刻裡，口音、身體與認同之間的三角關係循環反復，陸生的主體性也都在不斷的營造、變得更加飽滿。研究結果更發現，陸生在口音這件事情上所花的有意識、無意識的處理與感知的精力，或許比使用口音去對話還要更多，而這其中的原因或許與兩岸遺留的歷史問題、最初設定「陸生」的社經地位生產框架有關。

在經歷整個新冠疫情肆虐後（甚至到截稿時，在歐陸各國的疫情狀況並未結束，也難保是否未來會再重新興起），所有過去曾經以為被克服、得到進步解決的意識皆再度爆發：種族歧視、黨同伐異、數不清的性別不平等等。除了本文研究的內容，筆者事實上還在文獻回顧與自身的訪談經驗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在 2012 年之前的中國，絕大多數 GDP 的增速都在 10% 以上，儘管在 2012 年之後 GDP 發展進入了中高速期，增速開始減緩，但在中美貿易戰之前都仍可觀（郭旭紅, 2015）。而 2011 年開放來台的陸生裡，絕大部分都是在九〇年代之後出生，實際上是在「大國高速發展」的搖籃中長大，無論來自哪個鄉鎮幾乎都會有「小時候比較窮」與「現在日子過得好」的兩種社會經濟景觀觀察。故在 2015 年左右的研究論文中，陸生對於台灣社會運動（尤其是三一八反服貿）的評價多會建立在「經濟發展優先」的邏輯上，認為「國家應該要建立在穩定的經濟發展上」而無法認同與支持台灣人對於台灣主體性或現代民主性的追求；但在中美貿易戰開打、尤其是近兩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顯著趨慢之後，訪談到的陸生就較少提到「經濟第一」，而更多的會提到「情感認同」等因素。

另一方面，成長在以維穩為第一要事的大國裡的陸生，將更容易對衝進立法院、站在街頭舉標語等行為感到害怕、認定為是一種「擾亂社會秩序的暴動」。再觀經濟發展遠超大陸大多數省份的香港，三一八同一年港島也發生了浩浩湯湯的佔中運動，當時的內地生在受訪時就較少提到經濟發展，但反對者仍然不約而同的提到了「暴動」。直到香港經濟發展在 2014 年之後開始潮落(孫軍, 2016)，2019 年發生反修例運動時，反對者們「經濟至上」的邏輯再度出現。

「在我跟蔡博藝這類『明星陸生』之後，後面的學弟妹們感覺都不敢出來了」——多次為陸生群體爭取相關權益的首屆赴台陸生余澤霖，在某次與筆者的交流中流露出這樣的情緒。他以「過來人」的角度道出了陸生這十年來公共行動力逐步下降、公共聲音逐漸啞的現象觀察，筆者不曾知曉這是不是屬實，但也有一樣的擔憂；筆者在寫作過程中也曾想在「台灣社會」前面加一個「反中氛圍」的定語，但終覺覺得眼前所見這般氛圍的「結果」，並不可輕易定於整個「台灣社會」之前而掩蓋中間過程的發展脈絡——中國的國際壓制與物理性威脅、媒體與執政黨的或選擇性渲染等，細究其中任一原因，總能找到更複雜、而難以蓋棺定論的溯源。但來到這個「結果」裡的陸生，那些隱細入微的差別待遇卻總是從國族思考來、偶於性別、興趣、家庭中遊走一番，終再與國族思考綁定在一起。在這過程中每一步曲徑通幽的思考都會被窄化、扁平化與標籤化，詮釋成了辯說，理解化為高牆前的點到為止。

在《想象的共同體》中(Anderson, 2010)開篇直言所謂民族主義、國族意識等事物，都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且一旦被創造出來就會被模式化」；同時提到，在殖民地中，殖民政府常通過殖民教育使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擁有共同的語言，而雙語精英便會成為潛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者」——那麼可以隨時切換腔調的陸生在某種意義上也會成為最深入的一批臺灣認同者。但眾所周知，對於民族的想象可以使人在心中擁有一種濃烈的歷史宿命感，假使這份宿命感是人人所需，則既然陸生的認同已有所改變，那麼這份宿命感要在哪裡借放？個人經驗來看，這份歷史宿命感會上升為一種自為他者的觀照角度，視世界為一體，視地域性的特色場域為文化財富，是一種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珍惜情感——儘管共同體是想象的，然而相互連接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則兩岸生活帶來的重曝行為，皆將有意無意的聯結在陸生的心裡，或許會在日後的某一時刻如同「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般帶著令人不可思議的能量突然展現，那些碰撞迸發出的火花當被期許能照亮極端情境下的黑暗視域，帶來真正的內外溝通可能。

其中一位受訪者在分享就學期間印象深刻的事情時，提到台灣朋友對 TA 說的一句話：

他說「我們（台灣）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就意味着他知道他們不是中國（人），「但是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就是說台灣內部的這種共識還沒有。（HP-3）

台灣人在找尋自己是什麼的同時，踏入台灣的陸生也在另一個時空裡確認自己在哪裡。兩條時空痕跡宛如經典的 DNA 雙螺旋結構，若只從某一二維的平面直直的觀測，會誤以為兩條線存在眾多交疊的節點；但若拉遠、拔高視角，順著時空脈絡凝視時則會發現兩條線不過是不斷靠近又總保持距離的：陸生與台灣人的生命經驗雖在整個兩岸空間內被迫交織，但也同時因為兩岸政治被迫在短暫的靠近、甚至幾乎不算是接觸的情況下漸行漸遠。

當我們凝視兩條時空線裡發生的事件背後時，恰也是在解鎖整個兩岸社會的生物密碼：雙股螺旋結構僅能夠在電子顯微鏡下才能夠被看見，移動的分子之間如何轉譯更要不斷的在微觀（細胞）與宏觀（個體）、抽象（理論推演）與具象（生物人）之間轉換視角才能夠明了，那何況這一個個鮮活個體身上夾帶著的豐富而又迥異的生命經驗？他們在兩岸生活中帶著不同地理時空裡的濃淡口音、不同社會氛圍中習得的文化慣習、不同歷史語境內培養的意識形態對撞時，一個橫眉指問「間諜」，另一個則怒罵回應「傻逼」，這些來回的衝突似乎更像是政治孤兒們在不知覺中被放入不同培養皿裡、養精蓄銳多日後放出角力的現場。目前在端傳媒「兩岸關係四十年」的專題投稿區中，已經逐漸出現了「第二代」陸生³²的說法，但「當環境無人問津時，你我皆荒草叢生」，若兩岸公民社會不能找到一個新的合作方向、兩岸的媒體教育無法突破民族國族的藩籬，則不僅「第二代陸生」是水中月，甚至連「兩岸停火四十年」都會是鏡中花。

（二）研究缺點與局限

1、因為時間及疫情限制，筆者無法進入到更多的活動現場直接參與觀察陸生的公共行動狀況。

2、在文獻回顧中討論哈伯瑪斯傳統型公共領域時提到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聯，而按照 Gramsci (2006)的講法，公民社會事實上也是國家的觸角與延伸，

³²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576/（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

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維護、鞏固公家權益的場域之一。不僅是在威權/極權國家中才會出現無所不在的 state，哪怕是在民主體制下的「公民社會」裡，也依然出現難以察覺的國家滲透。這裡仍有許多待討論之處，但因為礙於篇幅與能力，並未能再額外爬梳國家理論，也未能展開討論兩者之間的界限與定義。

3、因樣本有限，故本次對於陸生行動類型的分類將僅限於訪談與文本觀察到的這群受訪者。

附錄

(一) 受訪者資料

NO.	性別	學校	係所	YEAR	省份/學位
XU-3	(F)	北部私立大學	商學院	3	浙江/學士在讀
FU-3	(M)	北部私立大學	商學院	3	遼寧/學士在讀
HU-3	(M)	北部私立大學	商學院	3	福建/學士在讀
XP-3	(M)	北部公立大學	企業管理系	3	上海/學士學位
LU-4	(F)	中部私立大學	物流管理	4	浙江/學士在讀
SU-4	(F)	北部公立大學	食品科學	4	浙江/學士學位
ZU-4	(M)	北部公立大學	人文社科	4	浙江/學士學位
RP-2	(F)	北部公立大學	文學院	2	黑龍江/碩士在讀
HP-3	(M)	北部公立大學	土木工程	3	北京/碩士在讀
XP-3	(M)	北部公立大學	藝術	3	遼寧/碩士在讀
HP-3	(N)	北部私立大學	人文社科	3	山東/碩士在讀
QP-3	(F)	北部公立大學	教育學院	3	上海/碩士在讀
ZP-5	(F)	北部公立大學	理學院	5	廣東/碩士在讀
HP-5	(F)	北部公立大學	文學院	5	廣東/碩士在讀
QP-5	(F)	北部公立大學	人文社科	5	福建/博士在讀
YP-7	(M)	北部私立大學	人文社科	7	南京/碩士在讀
LP-9	(M)	北部公立大學	人文社科	9	廣東/博士在讀

(二) 訪談大綱

一、 基本信息採集

Q1：就讀學校（不願意透露者可回答是北中南部國立/私立大學）、系級（不願意透露者可回答是哪個學院、來台第幾年）、GENDER？

Q2：為什麼會選擇來臺唸書？來之前對「臺灣」的想象是什麼？這些想象來自哪裡？現在這些想象有改變嗎？「你覺得像出國留學嗎？」

二、 社會生活狀況 | 口音影響

Q3：是否有人說過你「幾乎沒有口音」或者「口音不重」？

→IF YES：

- 1 是一開始就被這樣認為還是在生活一段時間後？
- 2 身邊是否有非臺腔口音的朋友？
- 3 你覺得你與他們是否有一些資源、關係網之類方向上的差別？（如果有的話）可以具體談談這個感受嗎？

→IF NO：

- 1 身邊是否有可以改變口音的陸生朋友？
- 2 你覺得你與他們是否有一些資源、關係網之類方向上的差別？（如果有的話）可以具體談談這個感受嗎？
- 3 那你會有刻意切換口音/保留口音的時刻嗎？
- 4 被認出口音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嗎？
- 5 是否被問起過你不願意與臺生談論的社會議題？為什麼？
- 6 在平時與臺生的互動過程中，會對自己的一些想法有所保留嗎？（同上）
- 7 有無交心的臺灣朋友（EX 師長、同學、夥伴）？

三、 公共領域交往狀況

Q4：在臺灣是否有參加過臺灣在地的一些集體活動（組織/社團/系隊...）？

→IF YES：

- 1 為什麼會想要參加？

2 你認為自己跟他們的相處融洽嗎？（如有融入，則契機是什麼？）

3 可以談談在這些活動的任何？

→IF NO：

1 沒有參加的原因？

Q5：是否參加/組織過有關陸生的一些集體活動（組織/社團/聯誼會...）？

→IF YES：

1 為什麼會想要參加？

2 你認為自己跟他們的相處融洽嗎？

3 可以談談在這些活動的任何一種感受嗎？

→IF NO

1 沒有參加的原因

2 你覺得你參加活動的感受，會因為主辦方是陸生還是台灣本土而有差異嗎？

Q6：是否有接受過一些臺灣本土的採訪？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想法嗎？

Q7：在您就學的這段期間，有無重大的與陸生相關的社會事件發生？（比如太陽花學運、陸生繳納健保問題、反修例運動、新冠疫情等等）

Q8：在當時您有參與相關的社會運動嗎？

Q9：如果有上街的可能，你會希望？

四、 開放性結尾

Q10：有無任何關於求學期間的細節（無論是否發生在台灣）想要分享？或者想要反問研究者的問題？

Q11：對此次訪談的意見與想法？

（請問是否為黨員？家中或者關係親密的親朋中有無黨員？）

(三) 訪談同意書及保密協定

親愛的受訪者你好：

非常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以下為本研究具體研究內容：

本研究的主題為「陸生的公共行動力變化，及行動、變化背後的意識與選擇」。將探討赴臺就學的陸生（此指一年以上的學位修習，不包括短期半年交換生），在「祖國邊緣」遊走時日常生活狀態的行為特點，會先以「藏口音」與否作為探究的經驗基礎，挖掘藏與不藏背後的行為展演（performance）動機，再以此看待每個陸生個體在台灣公民社會中的行動力、表現力與局限性。研究將在探討「一中」脈絡下成長廿年的陸生變化的基礎上，去挖掘陸生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單位與角色扮演，看其間是否有孕育衍生出一些曖昧地帶，又能給兩岸如今張力愈來愈大的拉扯關係以何種影響。

因此本研究會希望透過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方式，了解每個個案的生命經驗、每位陸生在台生活的行為脈絡；但因應疫情關係，部分受訪者將會轉為電話訪談進行。

訪談大綱之三大模塊：

（具體問題將在附件內附上，全程歡迎自由暢想、隨心回答）

- 1、基本信息採集
- 2、社會生活狀況（口音）
- 3、公共領域交往狀況

本研究進行的方式及相關承諾：

- 1、訪談前將請受訪者詳閱本份訪談同意書，在雙方確認無誤、簽名後即可開始訪談事項。
- 2、訪談時間約在 30-60min，訪談問題會根據情況作彈性改變。
- 3、訪談次數以 1-2 次為原則，若在研究上仍有需要受訪者再答復之處，則至多不超過 3 遍。
- 4、在訪談過程中，您有權決定是否回答、回答深淺，若引起任何不適皆可隨時終止。

- 5、 為研究需要，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以便日後騰作逐字稿做資料分析。為保護受訪者，錄音及逐字稿資料將在研究完成後即刻銷毀。
- 6、 在研究中，受訪者會以編號方式出現在論文裡，例如 XY-3；所有訪談資料將僅用作學術研究，受訪者之任何個人資料皆受研究倫理保護。
- 7、 研究過程中受訪者若有任何疑問可隨時請研究者說明。
- 8、 針對研究內容，受訪者有權提出建議，但研究者保留其著作權與修改編寫之權利。

以上內容我已詳閱，我了解本人對於此次研究之重要性與價值，願意接受訪談。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社會系

指導老師： 吳宗昇

協議時間：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深度訪談 / 電話訪談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參考文獻

中文期刊

- 陳欣之 (1996) 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 [ASEAN Member States'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Towar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問題與研究, 35(11), 15-33. doi:10.30390/isc.199611_35(11).0002
- 何春蕤 (2002) 認同的“體”現: 打造跨性別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 1-43
- 洪貞玲, & 劉昌德 (2004) 線上全球公共領域? 網路的潛能, 實踐與限制 資訊社會研究, 6, 341-364
- 謝瑤玲 (2009) 我要說什麼? 我該講什麼? - 茱利亞·阿爾巴瑞茲《嘉西亞女兒如何失去她們的口音》中的語言交錯與文化驚恐 [What Shall I Say? How Should I Speak?-Crosscutting and Cultural Terror in Julia Alvarez'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華梵人文學報 (11), 53-75. doi:10.29930/hjh.200901.0002
- 張瑞雄 (2010) 陸生來臺平議 師友月刊(512), 41-45. doi:10.6437/em.201002.0041
- 王嘉州 (2011) 來臺陸生的政治態度與臺灣主權接受程度 [The Impact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on the Acceptance of Taiwanese Sovereignty by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台灣政治學刊, 15(2), 67-113. doi:10.6683/tpsr.201112.15(2).67-113
- 藍佩嘉, & 吳伊凡 (2011) 在「祖國」與「外國」之間: 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 [Between "Homeland" and "Foreign Country": Liminal Identity and Boundary Work of Taiwanese Students in China] 台灣社會學(22), 1-57. doi:10.6676/ts.2011.22.1
- 蔡翠旭, 林翠蓉, 陳怡珮, & 程伊昉 (2012) 大陸學生在台灣生活適應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A Study of Life Adjustment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in Taiwan] 華人前瞻研究, 8(2), 15-42. doi:10.6428/jctf.201211.0015
- 王嘉州 (2012) 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 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之分析 [A Pilot Study on Attitude Change toward Unifi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臺灣民主季刊, 9(3), 85-118. doi:10.6448/tdq.201209.0085
- 吳伊凡, & 藍佩嘉 (2012) 去中國留學: 旅中台生的制度框架與遷移軌跡 [Taiwanese Students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Migration Trajectories] 臺灣社會學刊 (50), 1-56.

doi:10.6786/tjs.201209.0001

邵軒磊 (2012) 中國威脅論之解析- 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 [On "China Threat"-Perspective in Japanese Literatures] 中國大陸研究, 55(3), 85-105. doi:10.30389/mcs.201209_55(3).0004

吳秀玲 (2013) 陸生來台政策之評估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1 年度研究計畫案

黃萬傳 (2013) 開放陸生來臺就學之省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1), 32-39

李佩雯 (2014) 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究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An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Identities between Mainland Students and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傳播研究與實踐, 4(1), 129-171. doi:10.6123/jcrp.2014.007

郭旭紅 (2015) 經濟新常态背景下中国 GDP 中高速增长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2), 88-92

李思嫻 (2015) 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hina Threat": Discussion 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a "Peaceful Rise"]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11(1), 63-80

周欣怡 (2015) 開放陸生來臺政策制定之過程與現況分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4(5), 44-50

孫軍 (2016) 香港經濟發展的歷程，困難與轉型：一個比較的視角，Economic development, 1-24

周祝瑛, & 魯嬪文 (2016) 臺灣重大社會事件對於陸生之潛在衝擊與評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5(12), 76-82

王嘉州 (2016) 短期來臺交流陸生之社會接觸與政治態度變遷初探 [Social Contact and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Chinese Short-term Exchang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遠景基金會季刊, 17(4), 1-42

葉乃靜 (2018) 陸生與臺生互動情境中的資訊迴避行為研究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of Mainland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 Sociological Study]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44(1), 42-68 doi:106245/jlis.201804_44(1).0003

楊柳, & 陳懷林 (2020)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實證分析澳門大學大陸生和澳門生的態度差異和成因 [Impact of Media Use on Attitudes towards Varied Issues: An Empirical Stud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UMAC] 傳播與社會學刊(52), 57-86

許慧如 (2019) 後國語運動的語言態度——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調查 臺灣語文研究 第 14 卷 第 2 期

王明珂 (2020) 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0(3), 1-7

學位論文

尤淑嫻 (2005) 台灣廣播媒體與公共領域之討論——以 TNT 寶島新聲為例 (碩士) 世新大學,

古曉婷 (2015) 陸生與外籍生權益之比較——以中正大學陸籍交換生為例 (碩士) 南華大學, 嘉義縣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98zv28>

張育嘉 (2015) 一家人？異邦人？陸生來台的制度框架與國族劃界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 台北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n2p86d>

湯甘 (2015) 台灣新聞媒體及輿論對待陸生的情感傾向研究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新竹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nwq898>

嚴佳音 (2015) 當代台北市藝文咖啡館的觀察與分析：一個文化公共領域的成形 (碩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z6sry8>

黃亞楠 (2016) 適應在他鄉：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ymszfj>

黃崇山 (2016) 社會運動對於臺港陸生政治認同的影響：以三一八學運和佔中運動為例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

王鵬 (2017) 在台陸生運用心理位移面對適應困擾議題之經驗研究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台北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p62v3y>

羅曉妹 (2017) 差別對待下的無奈與灰色地帶：陸生對「不允許在學期間工作」的態度與因應 (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 嘉義縣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7zj284>

趙一鳴 (2018) 在臺陸生的跨文化適應研究 (碩士) 東海大學, 台中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h59c9y>

陳彥潔 (2018)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之社會保障:以大陸配偶與陸生為例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 桃園縣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jys6z6>

馮垂華 (2019) 尋找「跨族公共領域」：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中的族群關係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張可 (2019) 「自由祖國」還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臺陸生的認同、情感

與意義建構，中國大陸研究，62(3)，95-142.
doi:10.30389/mcs.201909_62(3).0004

徐恩惠 (2019) 政黨輪替後影響陸生來臺就學因素之探討 (碩士) 世新大學, 臺北市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1296/na8kix>

中文書目

- 舒茲 (Schutz, A.) (1991). 社會世界的現象學，臺北: 桂冠出版社
-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 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Vol. 66):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貝克 (Beck, U.) (1999) 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 風險與機會: 臺灣商務
- 孟樊 (2001) 后现代的认同政治 In: 台北: 扬智文化事业公司
- 張錦華 (2001) 傳播批判理論 臺北: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哈伯瑪斯(Habermas, J.) (2002).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 李丁讚 (2004) 公共領域在台灣: 困境與契機: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夏鑄九 (2004) 爭論公共性——公共空間的公共藝術 臺北: 臺北市文化局
- 吳介民 (2004)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 文化界公共領域的集體認同形塑 In 李丁讚等人 (Ed.), 公共領域在台灣: 困境與契機 (pp. 299-355). 臺北: 桂冠
- 楊 (Young, I. M.) (2007). 像女孩那樣丟球: 論女性身體經驗，臺北: 商周出版社
- 安德森 (Anderson, B.) (2010). 想象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臺北: 時報出版.
- 高夫曼 (Goffman, E.) (2017a). 公共場所的行為: 聚會的社會組織，北京: 北京大學
- 高夫曼 (Goffman, E.) (2017b).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北京: 北京大學
- 高夫曼 (Goffman, E.) (2017c). 污名: 受損身份管理札記，北京: 商務印書館
- 黃瑞祺, & 陳閔翔 (2018) 哈伯馬斯的民主理論: 允晨文化
- 蔡英文 (2002) 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英文參考資料

- Alvarez, J. (1991)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Chapel Hill.
- Anderson, B.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Verso.

- Ang, I.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Psychology Press.
- Arendt, H. (2013).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endt, H., & Kohn, J. (2006).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enguin.
- Armstrong, J. A. (1976). Mobilized and proletarian diaspora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2), 393-408.
- Aubin, F. (2014). Between public space (s) and public sphere (s): An assessment of Francophone contribu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1).
- Clifford, J.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 302-338.
-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R. (2008).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 Douglass, M. (2002). Civic spaces in a global age: An agenda for Pacific Asia c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PS-Nus Forum on Civic Spaces in the Cities of the Asia-Pacific.
- Fiddian-Qasmiyeh, E., Loescher, G., Long, K., & Sigona, N. (2014).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OUP Oxford.
-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25/26), 56-80.
- Gilroy, P. (1991). It ain't where you're from, it's where you're at... The dialectics of diasporic identification. *Third text*, 5(13), 3-16.
- Golding, P. (1996). World wide wedge: division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Monthly review*, 48(3), 70.
- Gramsci, A. (2006).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 reader*, 71-85.
- Gripsrud, J. (2007). Television and the European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4), 479-492.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na.
- Keane, J. (1995).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Communication Review (The)*, 1(1), 1-22.
- Kellner, D. (1997). Intellectuals, the new public spheres, and techno-politics. *New Political Science*, 169-188.
- Kramer, H., & Sprenger, J. (2007).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Cosimo, Inc.
- Levack, B. P. (2015).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outledge.

- Ma, R. (2000). Internet as a town square in global society.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93-106.
- McGuigan, J. (2005).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4), 427-443.
- Merleau-Ponty, M. (1996).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
- Moi, T. (2001).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 Postman, N. (2011). *Conscientious objections: Stirring up trouble about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Vintage.
- Safran, W.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1), 83-99.
- Schneider, S. M. (1997). Expanding the public sphere through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discussion about abortion in a Usenet newsgroup.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Sparks, C. (1998). Is there a global public sphere. *Electronic empires: Global media and local resistance*, 108-124.
- Szelényi, K. (2006). Students without borders? Migratory decision-making among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U.S. *Knowledge, Technology & Policy*, 19, pages64 – 86.
- Taylor, C. (1997).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ew contexts of Canadian criticism*, 98, 25-73.
- Taylor, C.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ölölyan, K. (1996). Rethinking diaspora (s): Stateless power in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5(1), 3-36.
- Weeks, J. (1990).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Quartet Books London.

網絡資料

高 墻 華 (2000) 教 育 大 辭 書 Retrieved from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488/>

中 正 e 報 (2020) , 陸 生 , 高 墻 下 的 陌 生 人 , Retrieved from <https://enewscuedutw/%E9%99%B8%E7%94%9F-%E9%AB%98%E7%89%86%E4%B8%8B%E7%9A%84%E9%99%8C%E7%94%9F%E4%BA%BA->

[ca0984d62098](#)

台灣人權促進會 (2020) 【聲明】兼顧人權保障之防疫措施 政府責無旁貸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ahr.org.tw/news/2603?fbclid=IwAR0Uh8bxUp-YGFeJYwlu9pKv4R-X-FfkHrOiMG9IY-f6AZUD_X5TrYK3ZSw

NGOCN. (2020). 准陆生：我是学生，不是政治牌 | 陆生赴台就读被停. Retrieved from

<https://matters.news/@ngocncat/%E5%87%86%E9%99%86%E7%94%9F-%E6%88%91%E6%98%AF%E5%AD%A6%E7%94%9F-%E4%B8%8D%E6%98%AF%E6%94%BF%E6%B2%BB%E7%89%8C-%E9%99%86%E7%94%9F%E8%B5%B4%E5%8F%B0%E5%B0%B1%E8%AF%BB%E8%A2%AB%E5%81%9C-bafyreifiiz7uvkb43pgsfzn77b5ihsvu22d6suecgt275oh66hherwdli>

許崇銘 (2020) 防疫中的「陸生返台政策」，為何令人憂慮？如何改善？ 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29-opinion-taiwan-mainland-student-policy-ncov/?fbclid=IwAR1d5wPDvQa2Q_LEM6fj4jP_a0zUu08uvjcVG5fO3MTeBKMfcFhhaYm57lg

境外生權益小組 (2020) 聯署信 Retrieved from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nti-isolation/%E9%A6%96%E9%A0%81?fbclid=IwAR0o-q0MrnZdcTt32uTwfrzj20789c-FuHT1SFodgfEnYvLSqH8WQg9otNY>

臺灣學生聯合會 (2020) 校園防疫不可失守——臺學聯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校園防疫措施聲明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NSUTsince2019/posts/464616874214450>

魏玟、郭力昕、王維菁 (2020) 一起打贏抗疫與人權的戰爭 Retrieved from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20200201/VAB5ETYELF33NHYVR6MJK73WYA/?fbclid=IwAR1jyztzgoeKqVckzdzuvrKHKjitehsxkAO8kcUv4_Biltl0ihSyATniVSw